

社会组织参与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的效果及原因分析 ——以莆田市 T 村为例

(申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培 养 单 位 : 公共管理学院

申 请 人 : 徐 婧

指 导 教 师 : 邓国胜 教授

二〇二五年五月

社会组织参与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效果及原因分析——以莆田市H村为例 徐婧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and Caus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Rural Areas: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T
in Putian City**

Thesis submitted to
Tsinghua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professional degree of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y
Xu Jing

Thesis Supervisor: Professor Deng Guosheng

May, 2025

学位论文公开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名单

公开评阅人名单

无（全隐名评阅）

答辩委员会名单

主席	朱俊明	副教授	清华大学
委员	崔之元	教授	清华大学
	孟延春	副教授	清华大学
	舒全峰	助理研究员	清华大学
	黎定高	高级工程师	北控水务集团
秘书	胡盼盼	助理研究员	清华大学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清华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清华大学拥有在著作权法规定范围内学位论文的使用权，其中包括：（1）已获学位的研究生必须按学校规定提交学位论文，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研究生上交的学位论文；（2）为教学和科研目的，学校可以将公开的学位论文作为资料在图书馆、资料室等场所供校内师生阅读，或在校园网上供校内师生浏览部分内容；（3）按照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督导、抽查等要求，报送相应的学位论文。

本人保证遵守上述规定。

作者签名： _____

导师签名： _____

日 期： _____

日 期： _____

摘要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然而，在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成为破解“输血式”治理困境的关键。当前我国众多村庄面临人口空心化问题，传统行政主导的乡村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文化断裂、社会资本流失等挑战，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力量，其“柔性治理”特性在激活社区主体性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

本研究以福建省莆田市 T 村为案例，探讨社会组织参与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作用机制与实践效果，并依据新内源性发展理论进行阐释。研究通过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等方法，系统梳理社会组织 2011-2024 年在 T 村开展的一系列实践，并运用准实验的方式，进一步论证社会组织参与对乡村内生动力激发的有效性。

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参与对乡村内生动力的激发效果显著：在主观层面，村民的自我认知、自我效能、风险偏好及从众倾向均得到有效提升；客观层面，村民在公共事务参与、自组织发展、志愿服务及主动学习等方面的行为转变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组织通过构建长期信任、搭建参与平台、协同内外资源及重塑文化认同等路径，形成了“建立信任—推动参与—赋能村民—孵化组织—构建认同”的递进式作用链条，有效破解了外源发展的“悬浮困境”，推动乡村从“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转型。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深化了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的认知，构建“意识觉醒-行为激活”框架，拓展“社会资本”内涵，推动新内源性发展理论本土化；实践价值则体现在提炼“触媒激活”模式，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提供行动策略。研究创新在于整合理论框架、细化作用机制，采用准实验设计与长周期质性研究结合，验证因果并阐释动态发展，能够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提供新范式。

关键词：社会组织；乡村内生动力；新内源性发展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serves as the overarching strategy for addressing issue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representing the essential pathway toward achieving agricultural strength, rural beauty, and farmer prosperity. As emphasized i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most arduous and complex tasks in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nation still lie in rural areas. It underscores the need to prioritiz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ly adv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under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to activate endogenous rural dynamics has become critical to overcoming the dilemma of “blood transfusion-style” governance. Currently, many villages in China face issues of population hollowing-out, whil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led rural governance struggles to address challenges such as cultural fragmentation and loss of social capital caused by rapid urbanization.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third-party actors, demonstrate unique advantages in revitalizing community agency through their “flexible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effec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stimulating endogenous rural dynamics, using Village T in Putian, Fuji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and interprets findings through the lens of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Employing methods such as in-depth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 survey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he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 series of practices implemented by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Village T from 2011 to 2024, further validating the efficacy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fostering endogenous dynamics.

Results reveal significant impac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volvement: subjectively, villagers exhibited enhanced self-awareness, self-efficacy, risk tolerance, and reduced herd mentality; objectively, behavioral transformations emerged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self-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volunteerism, and proactive learning. Further analysis identifies a progressive mechanism whereby social organizations build long-term trust, create participatory platforms, synergiz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and reshape cultural identity. This forms an action chain of “establishing trust → promoting

participation→empowering villagers→incubating organizations→constructing identity,” effectively resolving the “detachment dilemma” of exogenous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ing a transition from “passive blood transfusion” to “active self-regeneration.”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lies in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rural governance, constructing the framework of “consciousness awakening-behavior activation”, exp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promoting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theory of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 practical value is reflected in refining the “catalyst activation” model and providing action strategies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nnovation of this study lies in integrat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fining the action mechanism, combining the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ith long-term qualitative research, verifying causal relationships and explaining dynamic development, which can provide a new paradigm for relevant research on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s; Rural endogenous power;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目 录	IV
插图和附表清单	VII
第 1 章 引言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意义	2
1.2.1 理论意义	2
1.2.2 现实意义	2
1.3 研究方法	3
1.4 研究框架和写作结构	3
第 2 章 文献综述	5
2.1 新内源性发展理论	5
2.2 乡村内生动力相关研究	6
2.2.1 乡村内生动力的概念	7
2.2.2 乡村内生动力的激活路径	7
2.2.3 乡村内生动力的评价体系	7
2.3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	8
2.3.1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定位	8
2.3.2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介入路径	8
2.4 本章小结	9
第 3 章 社会组织在 T 村的实践	10
3.1 T 村概况	10
3.2 社会组织在 T 村的行动	11
3.2.1 教育发展	12
3.2.2 老人服务	15
3.2.3 社群发展	17
3.2.4 环境改造	17

3.2.5 文化传承	19
3.3 本章小结	21
第 4 章 社会组织参与激发 T 村内生动力的效果分析	22
4.1 T 村内生动力激发效果的评估方法	22
4.1.1 问卷调查法	23
4.1.2 深度访谈法	25
4.2 T 村内生动力激发效果的评估结果	25
4.2.1 主观发展意愿的转变效果	27
4.2.2 客观发展行为的激活效果	28
4.3 本章小结	30
第 5 章 社会组织参与激发 T 村内生动力的原因分析	31
5.1 T 村社会组织参与的特点	31
5.1.1 构建长期信任，深耕在地元素	31
5.1.2 搭建参与平台，孵化自治组织	34
5.1.3 协同内外资源，构建社会资本	37
5.1.4 重塑文化认同，激活内生动力	39
5.2 基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的解释	42
5.2.1 结构化嵌入：破解外源发展的“悬浮困境”	42
5.2.2 协同式赋能：重构内外资源的互动范式	42
5.2.3 文化再生产：激活内生动力的深层密码	43
5.3 本章小结	43
第 6 章 结论与建议	45
6.1 研究总结	45
6.2 启示与建议	46
6.2.1 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启示	46
6.2.2 对乡村振兴实践的建议	46
6.3 研究贡献	46
6.4 不足与展望	48
参考文献	49
附录 A 调查问卷	53
附录 B 访谈人员名单	59

目 录

致 谢	60
声 明	61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完成的相关学术成果	62
指导教师评语	63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64

插图和附表清单

图 1-1 技术路线图.....	4
图 4-1 T 村内生动力评估框架.....	22
表 4-1 实验组和对照组基本情况.....	23
表 4-2 T 村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资料.....	24
表 4-3 Z 村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资料.....	24
表 4-4 访谈对象及访谈概要.....	25
表 4-5 所在村庄对内生动力各指标的影响情况.....	26
表 4-6 主观发展意愿评估结果.....	27
表 4-7 客观发展行为评估结果.....	28
续表 4-7 客观发展行为评估结果.....	29

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意义深远。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乡村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乡村治理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节，关乎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面临诸多挑战，如人口流失、老龄化加剧、资源匮乏、环境恶化和经济发展滞缓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也凸显了加强乡村治理的紧迫性。乡村治理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村环境，吸引人才和资本回流，促进乡村经济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既是响应国家号召，履行社会责任，也是实现自身成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于2021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积极培育和发展更多的服务机构和服务类社会组织，完善服务运行机制，促进公共服务与自我服务有效衔接”。^[2]2022年2月，民政部和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2022年5月又印发了《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这些政策性文件都指出“要广泛培育和组织动员有实力有能力的社会组织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区域和领域，围绕乡村发展、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打造公益品牌”。^{[3][4]}可见，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这为社会组织在乡村发展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政策支持。社会组织凭借其公益性、志愿性和专业性等优势，将会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连接农村与城市、政府与民众的重要桥梁。

然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关键问题。乡村振兴不能仅依靠外部资源投入，更要激活乡村自身的发展潜力，实现从“被动输血”到“主动造血”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5]在党和国家大力支持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背景下，社会上呼吁多元主体，尤其是社会组织关注和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声音越来越多，同样切实介入乡村振兴发挥作用的各类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如今，这些社会组织已经逐步发展成为连接农村与城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对于我国乡村、的治理与现代化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社会组织通过提供多样化服务、增强社区凝聚力和促进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活力。通过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投身于乡村治理之中，多元的力量被汇聚起来，共同推动着乡村的和谐与进步，形成政府、社会、村民共同参与、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无论是在地方制度层面还是在乡村社会认知方面或多或少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境。此外，我国农村地区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现实状况与社会基础，发展进度不一，各地乡村振兴发展进程及面临的问题也千差万别，社会组织在不同乡村中的介入方式、治理模式也各不相同。因此无法从普遍性的角度论证社会组织参与过程中乡村治理的效果，必须将其放置在具体的案例中来，才能更好的把握“顶层设计的普遍性与地方实践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6]

因此，本文以莆田市 T 村为例，深入探讨社会组织参与对乡村内生动力的激发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参考。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社会组织在乡村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结合新内源性发展理论，深入探讨社会组织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效果，有助于深化对社会组织在乡村社区治理中角色和功能的理解。通过揭示社会组织影响乡村社区治理的过程和结果，能够丰富和完善农村研究和社会组织研究的相关理论，提升对乡村社区治理的全面认识，探索出更有效的乡村社区治理模式。

1.2.2 现实意义

以莆田市 T 村为案例，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宏观层面看，当前我国乡村治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深入研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效果，可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治理提供借鉴。从微观层面看，对 T 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模式及效果的研究，有助于完善 T 村的治理模式，解决现有问题，提高村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促进多元共治和谐氛围的形成，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总而言之，社会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社会组织不仅能够有效整合和利用本地资源，还能够通过社区参与、能力建设和社会创新等方式，增强乡村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

研究社会组织在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中的效果及其原因，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为实践中的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福建省莆田市 T 村为案例，采用单案例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深入了解社会组织参与对 T 村内生动力的激发效果，笔者多次前往 T 村进行实地调研。

在问卷调查方面，为评估 T 村社会组织参与对主体性内生动力的激发效果，选取基础条件相似的隔壁 Z 村作为对照组。考虑到 T 村在村村民以妇女和老人为主，问卷调查采用线下方式进行，并采用偶遇抽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涵盖一般人口学变量以及依据内生动力评估框架设计的问题，旨在通过对比两组数据，呈现社会组织参与对 T 村内生动力的激发效果。最终 T 村回收问卷 113 份，Z 村 64 份，共 177 份。

在访谈调研方面，选取 T 村书记、社会组织项目负责人、核心志愿者、乡贤代表等 7 人进行深度访谈，并在问卷调查结果出来后，补充访谈了 Z 基金会 T 村项目的历任负责人。同时，收集新闻媒体报道、社会组织的工作计划书、工作报告及大事记等资料，为研究提供充分参考。通过对调研资料的文本分析和深入挖掘，总结和探析社会组织参与有效激发主体性内生动力的原因。

1.4 研究框架和写作结构

本文围绕社会组织参与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这一核心主题，采用层层递进的结构展开研究与论述。

第 1 章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介绍了研究方法，并阐明研究框架和写作结构。第 2 章梳理了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的产生背景、核心观点及基本特征，同时，对乡村内生动力的概念、激活路径、评价体系以及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定位、介入路径等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通过对现有研究的评述，提出以新内源性发展理论为分析框架，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第 3-5 章是案例研究的核心部分。第 3 章详细梳理了社会组织介入 T 村的具体路径和实践活动，详细介绍 T 村在人口结构、教育、文化、村庄治理等方面面临的发展困境。进而阐述 2011 年起以 Z 公益基金会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在 T 村开展的系列实践活动，涵盖教育发展、老人服务、社群发展、环境改造、文化传承五个板块，展现社会组织的具体行动。第 4 章通过构建主观发展意愿和客观发展行

为两个维度的内生动力测量体系，运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 T 村内生动力
的激活效果进行评估，对比 T 村和 Z 村的数据，评估社会组织参与对 T 村内
生动力的激发效果，为后续原因分析提供依据。第 5 章基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
深入剖析社会组织在 T 村参与的特点，从构建长期信任、搭建参与平台、协同内
外资源、重塑文化认同四个方面揭示其激发内生动力的深层动因。同时，从结构
化嵌入、协同式赋能、文化再生产三个理论层面解释这一过程的动态逻辑，探讨
社会组织如何突破传统外源发展模式困境，实现内外资源有机融合。

第 6 章基于前文的研究，总结了研究成果，分别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和
乡村振兴实践两个方面提出启示与建议，阐述研究在理论框架、新内源性发展理
论机制深化以及方法论层面的创新贡献，同时指出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研
究方向进行展望。文章结构如图 1-1 所示。



图1-1 技术路线图

第2章 文献综述

2.1 新内源性发展理论

现代社会发展主要经历了从“外生型”模式到“内生型”模式，再到“新内生型”模式的发展转变。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发展危机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源动力的推动。在许多国家，这种依靠外源动力实现乡村振兴的模式曾一度被视为打破农村衰落周期的最有效手段。^[7]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外源发展模式”由于对外部资源及资本的过度依赖，也产生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权力不平等、环境破坏和不可持续性问题。^{[8][9]}外源发展模式下，由于外部参与者保留对乡村资源的主要控制权，往往使乡村无法实现真正且持续的振兴，^[10]且忽略了乡村个体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侵蚀了乡村的主体身份和自治能力。^[11]

在对传统外源式发展模式的反思和超越基础上，内源性发展理论应运而生。^[12]内源性发展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导向型”的发展方式，^[13]是基于区域自身需求和内源性潜在用途的自主参与式发展。^[14]内源性发展尤为强调发展驱动力的内部性和农民参与的主动性。^[15]还有学者指出，实现乡村内源性发展必须从提高当地村民的领土认同感出发，从而提高其当地意识，当地身份和认同感。^[16]内源性发展以全新的范式来解读乡村的发展，但这种不依靠外力完全依靠自身的发展方式太过脱离现实，^[17]尤其对一些偏远的、人口老龄化严重和基础设施有限的乡村地区而言。^[18]

基于对外源性和内源性理论的反思，新内源性发展的提出提供了一条超越二进制的方法通道，建立了以外部和内部力量协作实现乡村发展的崭新范式。^[19]在新内源性发展的概念中，本地因素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强调当地潜力与外部影响的整合，从而最大化当地资源的价值，释放出更加广泛的发展潜力。^[20]

有学者在研究中对新内源性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详细阐释，认为内部资源是乡村发展的基础，组织动员是乡村发展的关键，身份认同是乡村发展的重要保证。^[21]其中，实现乡村村民的身份认同是唤醒地方民众主体意识、激发其参与乡村建设、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因素。^[22]还有学者将新内源性发展的过程概括为三点：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内外资源的优化整合以及实践过程的价值生产。^[23]也有学者将认同、合作、赋权、创新概括为新内源性发展的四大核心变量。^[24]

总而言之,新内源性发展以多元行动者为基础,从整体视域下建立并联动包括社会资本、市场、技术等外部资源和包括自然资源、居民主体等内部资源。^[25]在实现新内源发展过程中,内生动力和外源动力分别被看作是乡村发展的根本和实现手段,而实现新内源发展的关键则是实现由外源动力主导向内生动力主导的转换。^[26]有学者指出,新内源性发展理论下的乡村发展是由两种力量推动的,其中外部力量的两个重要来源分别是政府主导下的国家力量和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会企业等社会中间力量,这两类外源力量在乡村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促进者和服务者的角色,承担着使乡村发展内外主体及力量实现动态交流、良性互动和内外共赢的重要责任,是激活乡村发展内源动力的前提和必要条件。^[27]在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看来,乡村发展的内外部力量不是对立和排斥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28]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着重于促进内外部资源的联动作用,旨在将外部刺激转化为乡村内部发展的动力。^[29]新内源发展将“地方-超地方”框架带入到乡村发展研究之中,^[30]不仅肯定地方的主体性及其独特价值与文化,还将“超地方”要素视为乡村发展的补充资源。该理论认为,发展实践需汇聚地方行动者、政府机构与社会力量的合力,^[31]强调构建多元社会行动者间的协作关系,以共同推进地方发展进程。^[32]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归纳和整理,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它延续了内源性发展“自下而上”的理论视角,尤为强调乡村及其村民在乡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其次,该理论强调内部与外部力量、地方与“超地方”元素的协同发展,既坚守内源发展的核心价值,又接纳企业、社会组织等超地方因素与农村内生力量的互动融合。最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还将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农民和乡村的全面发展。^[33]从实质上看,新内源性发展理论强调的是乡村内外部因素的互动与调和,这表现为外源与内源力量间的竞争、自我调整、逐步适应及平衡的动态演变,更加着重于利用外部资源激活内部潜能。^[34]其中,主体参与是核心驱动力,以外促内、由内而外是关键,最终目的是达成价值共识与提升。

2.2 乡村内生动力的相关研究

事物发展的驱动机制主要包含两种类型:外源动力和内生动力。外源动力一般指来源于事物外部且间接作用于事物发展的过程之中作用力。内生动力通常产生于事物内部并直接作用于事物发展过程之中,是个体为了达到某种需求而自发产生的内在驱动力。^[35]与此相对应,乡村发展的动力源也被区分为外生动力与内生动力两种范式。^[36]现有的关于“内生动力”的文献多集中于脱贫领域,有关

“乡村内生动力”的文献也多聚焦于贫困乡村。

2.2.1 乡村内生动力的概念

乡村内生动力的提出是伴随着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生的。^[37]但截止目前,学界还未对“乡村内生动力”有较为统一的概念定义。一些学者基于历史视角对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形成了阐释框架。李培林通过梳理近百年中国乡村发展相关的研究,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界定为农民的主体行动和选择。^[38]刘晓雯和李琪从我国乡村人口变迁的制度和经济特征中发现,内生动力就是农村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他们的发展、权利和保障三方面需求构成了内生动力的基本要素。^[39]还有学者通过对官方文件的梳理总结后将乡村内生动力的基本要义概括为:主体是农民,根本在于农民主体性作用,尤其是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指出乡村内生动力是由乡村内部固有的各种要素条件为满足乡村生存发展需要融合而成的力量总和。^[40]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的乡村发展仍需依靠外源动力要素的大量介入,政府主导下的发展忽视了乡村社区的主体力量,而乡村的内生动力才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41]

2.2.2 乡村内生动力的激活路径

在乡村内生动力的激活路径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需要激发村民自身的发展自觉才能真正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有学者认为乡村内生动力源于乡村社会中村民主体,主体成员自发对乡村本土资源组合条件、产业结构形态、文化价值理念等要素进行主动挖掘、创新,从而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力量。^[42]有学者认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必须用好“人”的因素,以尊重当地环境和传统文化为前提,充分挖掘利用本土优势资源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43]还有学者指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路径是统筹好乡村中基层党组织、乡村社会组织以及村民等各种治理体系主体间的协作关系。^[44]

2.2.3 乡村内生动力的评价体系

目前关于乡村内生动力评价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已有学者进行了探索。部分研究从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生态保护等多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衡量乡村内生动力的发展水平,为乡村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周迪在对“脱贫内生动力”的测量中,将其分为需求型和手段型内生动力方面。需求型内生动力指标包括:自我认知,反映个体对自己的洞察和理解,影响经济决策;自我效能,体现个体对完成某事的自信程度,影响自主发展意愿;

风险偏好, 衡量个体对风险的喜好和承受能力, 影响经营决策; 从众心理, 指个体受外界行为影响的程度。手段型内生动力指标包含: 健康, 以健康对工作的限制程度衡量, 影响脱贫的客观条件; 教育, 通过教育对工作的限制程度体现, 能改善认知、提高收入; 技能, 用技能对工作的限制程度表示, 是实现持续脱贫的重要手段。^[45]

2.3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

2.3.1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定位

在当代中国, 乡村治理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 更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它涉及到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多方面力量的有效整合, 形成一种多元共治的格局。2017年6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将我国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大致划分为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及社会组织四大类。^[46]其中, 社会组织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尤为突出, 并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重点。

蔡斯敏认为, 乡村社会组织能够合理协调乡村中不同利益治理主体间的关系, 有效满足各种利益诉求, 将分散的农民联结起来, 是村民自治机制的重要补充。^[47]于健慧认为, 社会组织在强基层治理和促乡村善治过程中, 扮演者公共服务提供者、公共政策倡导者、社会价值捍卫者、社会资本建设者等多重角色, 对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功能。^[48]彭世钦认为,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 社会组织可分为乡村本土发展起来的具有草根性、互助性的内生性社会组织和除内生性以外的、更具专业性的外源性社会组织。^[49]

2.3.2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介入路径

Friedmann曾在研究中强调, 社会组织应通过赋能和参与式发展来参与乡村治理, 从而激发乡村内生动力。^[50]于健慧认为, 社会组织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政策倡导、社会资本建设等路径具体介入中国的乡村治理。^[51]在我国, 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治理主要是通过直接参与、引导参与、协同参与三种实现路径。直接参与往往是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实现参与治理; 引导参与则是通过提供专业化服务引导乡村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 协同参与则是落实多社联动, 推动积极参与氛围的构建。^[52]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社会组织通过提供各项公共服务从而帮助减轻乡村老龄化、空心化等问题,^[53]同时社会组织的加入还有助于优化乡村资源的利用, 从而促进乡村综合价值发展。^[54]

2.4 本章小结

通过梳理文献，笔者发现学界已跳出二分法的视角来研究乡村发展的动力模式，乡村振兴是内外部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乡村振兴的根本力量还是在于能否借助外部力量真正激发出内生性动力，这也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的观点相契合。社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中的关键角色，其在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现有研究并未对社会组织参与下乡村内生动力的激发效果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乡村内生动力的激发路径也没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界定关键概念，厘清研究重点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本文采纳现有研究普遍对内生动力的理解和界定，重点关注社会组织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效果和路径，通过对案例的充分和深入挖掘，进一步拓展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的应用场景和理论内涵。

第3章 社会组织在T村的实践

3.1 T村概况

T村隶属于福建省莆田市，地处东南沿海，距镇政府所在地约3公里，距市区约30公里，南距前海、北距后海都较近。全村总面积1.3平方公里，下辖6个自然村，共有8个居民小组、945户4417人，其中男性2257人、女性2160人，人口较多的姓氏有：欧姓、李姓、陈姓等。常住人口3460人，其中60岁及以上1031人，占29.8%；青壮年劳动力1823人，占52.7%；16岁及以下599人，占17.3%。外出流动人口从事行业主要为经商和务工。无少数民族人口。地处亚热带海洋型季风气候区，光照、雨水充足，但因处于沿海地区，每年7、8月易受台风侵袭，除基本耕地和海盐外，村庄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村内人均耕地仅0.16亩，村内原有较多水道、池塘，曾在农田灌溉、蓄洪和排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后由于疏于管理和不合理开发，多个池塘、沟道被人为填埋占用，或被水浮莲、芦苇、黑土、垃圾等占据，水系堵塞、恶臭连天，村民环保意识淡薄，环境脏乱。人均耕地少、土地盐碱化、灌溉水资源不足、农业劳动力流失以及集体经济弱化等问题制约了农业发展。农作物主要以花生、番薯等耐旱作物为主，少数村民从事水产贩运生意。制造业也多为家庭小规模生产，多为加工业，如石料、木材、铝材、珠宝、服装加工等，虽村庄离海较近、政策支持、交通便利，但集体经济缺失、征地困难、工业发展资源短缺、劳动力流失严重、非宗教类公共文化缺失、环境卫生问题突出等因素，阻碍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当地商业以小型家庭经营为主，如食杂店、杉木代售等，市场范围多局限于本村，年轻村民多外出经商和打工。

人口结构方面，T村面临着严重的村庄空心化问题，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留下老弱者守家，长期以来形成男性外出务工、女性承担家务的分工模式。老人、妇女和孩子组成了村庄常住人口的主体。老人活动较为单调，主要是打牌、搓麻将和拉家常，老年会的辐射效应微弱，难以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妇女承担了大量农活和家务，少部分从事珠宝、服装加工工作，生活较为枯燥。

教育方面，T村历史上曾拥有社学、义学、私塾以及书堂等教育机构，但随着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或经商，导致教育水平出现下滑；村庄过去重男轻女观念重，义务教育普及前，妇女识字率极低，且基本不会说普通话。义务教育普及后，村民虽重视教育，但该村庄小学在教学设备、师资力量、教学方式等方面较落后。

尽管一些本村富商曾通过捐赠等方式支持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整体上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教育水平。

文化方面，该地拥有莆仙戏和木偶戏等传统文化，但逐渐没落，且村民对其认知淡薄，参与度低。佛教、道教、基督教在村里均有信众。同时，村里攀比之风盛行，在建筑和婚嫁方面表现明显，造成资源浪费和家庭负担加重。许多传统民俗和文化活动逐渐消失或淡化，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逐渐减弱。

村庄治理方面，村集体经济缺乏，“两委会”治理动力不足，村民参与热情不高，基层民主建设难以落实，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能力不足。村民中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且较少参与公共事务，在公共决策中也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在公共决策中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村民整体上公共参与都较为有限；同时，村民和村委对于社会组织及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缺少认知，对于社会组织持怀疑态度；村庄乡贤参与乡村建设的渠道也较为传统单一，依旧停留在修建学校和宗庙等项目，未能形成合理高效的参与模式。

综上所述，T村恰似许多沿海乡村的缩影，地理环境虽有一定优势，却因资源利用不善、环境破坏等问题限制了发展；产业结构单一且发展受阻，人口空心化，教育水平滞后，文化认同弱化，公共参与度低，社会资本薄弱……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T村逐渐丧失了村庄活力，陷入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

3.2 社会组织在T村的行动

2011年，Z公益基金会携手R乡村建设中心，将T村列入“爱故乡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项目点，开始探索社会组织在地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路径，旨在通过社会组织第三方的介入和融入促进乡村“自下而上”的内源式恢复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以服务为切入点，逐渐探索出作为第三方独立实体协同乡村治理和发展并发挥作用的有效手段，有效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中村民、志愿者、乡贤等主体性的深度激活和地方元素的探索和打造。社会组织在入驻村庄之初以“T村社区大学”的名义正式落地，R乡建中心参与汀塘社区大学相关工作，为乡村发展提供理念和智力支持。携手镇政府、村委、村小学等举办了大量的文化教育活动，并动员起村民、乡贤、大学生志愿者等主体，促进乡村公益可持续发展，推动当地乡村发展和社会管理创新。

T村的发展离不开多个社会组织主体的支持，其中包含：一是社区大学（后注册为F社区服务中心），主要开展早期的扫盲班、普通话班、妇女文艺队、儿

童四点半课堂、夏令营等文化活动，推动十音八乐班、腰鼓队、军乐队等兴趣组织发展，引导环境整治项目和村民议事机制的形成；二是 Z 公益基金会，引进社区大学后，持续链接外部资源，同时资助福寿金、林阿润教育基金、梦想奖学金等项目，开展 T 村微基金项目，支持“乐居 T 村”养老项目、“老宅新生”文化保护项目、村志口述史项目等。三是福建省 Q 社工机构，于 2020 年受 Z 公益基金会邀请执行“乐居 T 村”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提供健康监测、精神慰藉、生活照料等服务，培育志愿者队伍，组织居民议事会，推动互助养老模式；四是 S 公益发展中心，资助池塘恢复工程、奖教奖学项目、重病救治等，规范资金管理，确保项目透明执行；五是 Y 民间文化团队，参与“老宅新生”项目，改造乡村石厝为文化空间。

这一社会组织促进乡村内生动力发展的渐进式路径，并非迅速成型，而是历经了自 2011 年至今长达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与实践，本文将其分成教育发展、老人服务、社群发展、环境改造、文化传承五个板块。

3.2.1 教育发展

在 R 乡建中心十多年总结出的“文化入手，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经验指导下，T 村社区大学在 2011 年成立之初，便与镇政府、村委、村小学等携手举办了大量的文化教育活动。

1. 妇女项目

(1) 成人教育项目

由于历史、经济等多种因素，T 村中很多妇女在以前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导致村中很多妇女不会说普通话、不识字的情况大量出现，如今随着社会发展，许多妇女有强烈学习诉求却苦于没有合适的平台。而社区大学的使命正在于探索新时期平民教育的自主创新，推动教育机会平等和社会公平，于是社区大学决定开办成人教育项目，即扫盲班，以回应妇女的学习需求。

如此，T 村社区大学扫盲班便在社区大学工作人员的筹备和暑期高校志愿者的推动下开展了起来，经过教学探索和经验总结，形成了乡村特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扫盲班任课老师即是社区大学相关工作人员、实习生和志愿者，同时发动了当地的中、小学生参与助教，充分调动村庄资源，形成村庄互帮互助的文化氛围。教学内容主要是拼音、常用字词、日常对话等，非常贴近生活，老师还会根据学员的需求灵活进行课程设置。为方便班级管理，扫盲班设置了班级组长负责制，加强了班级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日常一周上六次课，周三放假，每次上课时间为 19:00-21:00，分上、下两学期进行教学，每期约 20 个学员名额。

通过开展成人教育项目，并带领班级创办一系列活动如重阳节晚会的诗歌朗诵、大合唱等，T村社区大学的工作在村庄中获得了认可。成人教育项目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乡村传统对于妇女的固有观念，引导和激发了社区其他村民的学习意识，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2）文艺队

为丰富村民的娱乐生活，社区大学组建了妇女文艺队，包含腰鼓、盘鼓、扇子舞、广场舞等多种类型。2011年9月14日，社区大学特别从河南请来了“中原鼓王”衡生喜，专门来给T村的父老乡亲教授腰鼓队和盘鼓队。文艺队从最开始只有一个人报名，且完全依赖社区大学的志愿者开展教学，到后来村民们不仅踊跃报名参加，还涌现出了先学会的队员主动教授新进入的队员的现象，大家一起学习和排练，相互切磋，文艺队队伍逐渐壮大，并发展成了村庄各种活动和晚会的表演主力，甚至作为特别嘉宾外出进行演出和交流，走上了商业演出的模式，这不仅提高了文艺队成员的自信力，增强了她们的村庄认同感，也进一步增强了村民们对社区大学的认可。

除此之外，社区大学还推进了妇女协会（妇女之家）的成立，引导协会在每周固定时间开展聊天会，为妇女营造了一个交流诉说的空间，并积极链接妇联和相关资源，推动亲子教育项目、女性保健健康讲座的发展和落实。

2. 儿童项目

儿童教育也是T村社区大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T村的儿童大部分父亲甚至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孩子们跟着爷爷奶奶在村里生活和学习。为营造更好的村庄教育环境，促进T村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社区大学联合R乡村建设中心为村里儿童开展了一系列活动。R乡村建设中心每年暑期会开办“夏雨雨人”夏令营，从全国各地召集大学生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再将他们安排到各个项目点进行为期3周的社区服务，从2011-2015年，夏令营活动累计服务T村留守儿童超过1000人次。

（1）农家书屋项目

2011年10月1日，福建农林大学的夏令营志愿者带着在校募集的近700册书籍来到T村社区大学，协助T村筹建农家书屋与学生图书室。2012年9月25日，T村社区大学农家书屋进校园项目正式启动，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问题，阅读课只能放在学校中举行，社区大学就把农家书屋的图书搬到了学校，社区大学的实习生和志愿者进到学校带着孩子们一起阅读和分享，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提高了孩子们的阅读量，拓宽了孩子们的视野。

（2）小志愿者项目和爱故乡记者团

2011年10月15日，T村社区大学成立了小志愿者协会，协会主要是由30位三年级和六年级的小朋友组成，社区大学工作人员对小志愿者们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培训和制度性的管理，并通过奖励机制来激发小志愿者们积极性。第一批小志愿者成立了临时环卫队，一手包办了村里的卫生清洁工作，打扫了老年协会、社区大学、丰荣书社和广场。小志愿者们还担任农家书屋的图书小管理员，协助工作人员进行农家书屋内的书籍整理和分类。同时，小志愿者们也是村里的宣传小能手，负责村庄的环保宣传工作和各种大活动宣传工作。

为进一步培养小朋友的村庄认同感和参与感，社区大学还组织小朋友们担任村庄的小记者，采集社区新闻，并出版报纸《可爱T村》，以这种方式让小朋友们认识自己的村庄，发现自己村庄的魅力，挖掘村庄的文化，加强了小朋友们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3）“四点半”课堂

由于村里的小学生放学较早，在放学之后到吃晚饭之间，孩子们有一段较长的空着的时间，于是T村社区大学组织了“四点半课堂”，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做作业，并且能够得到社区大学工作人员的辅导，也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玩耍，或者做智力游戏，学习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除此之外，社区大学还为孩子们举办了周末兴趣班、“一米”菜园等多项活动，并一直以社区大学的公益理念和方式陪伴着孩子们的成长，儿童项目得到了家长和村庄的认可，家长们看到孩子们的变化后，也都愿意来帮忙，或者捐赠活动经费，帮助村庄儿童活动良好延续。

（4）梦想奖助学金、林阿润教育基金

同时，Z公益基金会的主要资助方Z集团也关注到了T村的教育，莆田当地素有“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传统，非常重视读书。为激励莘莘学子们努力进学，Z集团在Z基金会捐资设立梦想奖学金，为T村籍考上大学、重点高中的学生提供3000-20000元不等的奖学金；同时设立梦想助学金，为申请的T村籍贫困学生提供每年3000元助学金。2014-2020年共有109名T村籍学子获得梦想奖助学金。在此基础上，Z公益基金会还组织T村大学生公益活动，培养大学生的志愿服务精神，引导其回馈家乡，奉献社会。

此外，为了让T村小学教师们没有后顾之忧，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上，Z集团在Z基金会捐资设立林阿润教育基金，为T村小学教师提供每月600-700元不等的教学补助，并设置每年每人3000元的学习基金和教师创新课题基金，为鼓励教师们学习和创新，针对学习基金和课题创新两项表现最突出的老师，还会授予奖励和奖金。2017-2020年林阿润教育基金补助教师730人次。在

此基础上，Z基金会还与T村小学合作增设素质教育课程——绘本阅读课、美术创作课，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激发孩子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

3.2.2 老人服务

1. “十音八乐”项目

十音八乐是莆田的民间音乐，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用于庆祝节庆如春节、迎神赛会、社宫菩萨生日以及群众办喜庆热闹之事时，是极具乡土风情的管弦丝竹合奏的乐音。2012年4月，在村民的主动申请和积极报名下，社区大学组建了一个五十人的十音八乐班，但是却没有合适的老师，于是社区大学工作人员上网呼吁寻找十音八乐的老师，得到了《莆田晚报》的报道并引起了“十音八乐”传人林志贵老师的注意。在Z集团、莆田晚报、莆田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梦想莆田”栏目组支持下，林志贵老师来到T村授课，帮助T村的老人们圆他们的“十音八乐”梦。

2012年6月5日，T村社区大学的“十音八乐”班成立，十音八乐课堂在T村如火如荼地办起来了，前后共有89名村民参与其中，经过练习，共有48名村民形成了稳定的十音八乐队，每周自发组织固定时间地点学习，并积极进行村庄公益演出，获得了村庄和镇上的一致好评。在班级管理方面，T村热心村民一直在为这个十音八乐班对接资源，并积极协助社区大学工作人员，建立了一个十音八乐班的负责人架构，形成组长负责制，逐渐由村民独立进行运作。2017年初，村民自行组建T村军乐队并运作顺利，进一步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十音八乐班的成立，提升了T村村民的整体文化修养，促进了村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十音八乐班组织性较强，涉及范围广，班级里的很多成员后来都成为了村庄骨干，对于村庄动员工作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T村的凝聚力，对T村整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福寿金

由于T村高龄老人较多，且村子空心化较严重，许多老人的子女无法在身边照料，于是Z集团在Z基金会捐资设立福寿金项目，委托T村社区大学和村里的志愿者为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组织发放每月500元-2000元不等的养老金，2014-2020年福寿金补助老人共达到20999人次，让村中老人老有所养，生活质量得到提升和保障。

3. “乐居T村”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T村户籍人口4417人。其中常住人口3460人，60岁以上1031人，老龄化率29.8%，老龄化程度高。2020年5、6月，Z公益基金会与福建省Q社工机构联合

开展T村调研走访发现老人空巢、留守及代际抚养的家庭居多，老人和子女的情感联结不足，村庄照护资源不足，老人活动较单一，村庄老人在健康促进、身体照护、精神陪伴、社区参与和自我实现等方面有着普遍需求。为回应老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养老需求，Z公益基金会联合L集团、Z集团发起“乐居T村”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委托福建省Q社工机构执行。项目透过专业化服务手法为68岁以上弱老提供健康照顾服务，为50岁以上健老提供快乐参与的社区活动，整合辖区多方资源为村庄创造爱老敬老氛围，提升老人居家养老幸福感。

项目运用“全人照顾”理论，致力于构建一个适合老人居住养老的“乐居T村”。服务聚焦“健康+快乐+安居”三大主题，提升老年健康水平，发展老人优势潜能，推动互助养老，整合村庄内外资源，打造“五社联动”的服务模式。

“健康T村”通过建立个性化的健康档案，提供入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尤其关注高龄、行动不便、独居老人的需求。此外，项目还通过睦邻点提供定期的健康讲座和社交活动，增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快乐T村”模块通过文化、文体和文艺学堂，为老年人提供学习和参与的机会，包括写字、电子设备使用、安全教育、广场舞、腰鼓、小剧场、画画、剪纸和织毛衣等课程，旨在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提升生活质量，增强身体素质，丰富精神生活。“安居T村”模块则着重于营造关爱老年人的社区环境，通过培育志愿者队伍、召开居民议事会、建立资源库和举办生日会、节日庆典等活动，鼓励村民参与养老服务，形成互助养老的氛围，同时提升社区凝聚力。

在项目管理上，项目团队定期接受督导和培训，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视频号等社交媒体平台积极宣传服务和活动，提高项目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定期举行的联席会议，与村委会、捐赠方、社工机构等利益相关方沟通协调，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持续改进。

经过四年的持续运作，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建立老人健康档案436份，开展入户精神慰问3125人次，健康监测8922人次（睦邻点血压、血糖、尿酸监测，不含入户监测）等，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健康意识和自我照护能力。通过老人学堂开展的70次活动，服务1374人次，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培育志愿者80人，通过志愿者服务和开展居民议事会，也增强了乡村社区的凝聚力和互助精神。

“乐居T村”项目联动村（居）委会、志愿服务队、基金会、村庄骨干、社会资源，形成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社区慈善资源、社区志愿者的五社联动服务模式，通过合作机制摸索激发乡村发挥自有优势进行自我服务的养老路径，因地制宜地回应和解决了乡村社区的养老需求，减轻了家庭、社区的养老压力。

3.2.3 社群发展

推动农民自组织是社区大学的一个重要目标，R乡建中心和T村社区大学认为，依托社区大学和志愿者作为外部力量进入村庄，激发村民主体意识的成长，进而促进乡村内部自组织的形成并承担村庄公共事务，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推动村庄的发展，以“外发促内生”。因此，在文化教育工作中，社区大学有意识培养舞蹈队、腰鼓队、盘鼓队、十音八乐队等队伍中的骨干村民，推荐他们参加R乡建中心举办的各类的培养农村带头人的培训，并且有意在工作中激发村民的主体性，比如请村民负责活动的操办，组织村民讨论村庄事务，培育村民的公共意识和参与意愿。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村庄带头人逐渐涌现出来，他们的共性是：有理解力、组织力和行动力，并且愿意参与和承担公共事务。社区大学在村庄调研中发现：T村内很多村民其实很有公益心，外出做生意的T村人也有意回报家乡，Z公益基金会也愿意拨一笔资金，用于发起一个T村村民可以持续参与和投入的平台，于是，2012年5月，社区大学开始着手召集成立可持续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通过热心村民的层层推荐，社区自组织的骨干和村庄其他贤达人士一起，共同构成了“可持续发展协会”的20位初创人员，并经过开会逐步讨论确定了委员会的组织框架，包含会长、会计、出纳、审批人以及账目公开人等共10个人，可持续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就此成立，又名可持续发展协会。协会根据村庄实情设置了多项基金如文艺基金、环境整治村庄基金、教育基金等，希望通过协会自己管理这些基金，能够把资金用到实处，使T村逐步向好。

3.2.4 环境改造

1. 爱故乡环境整治项目

2012年，Z公益基金会给T村社区大学拨款10万元，作为可持续发展基金，经几次开会商量，协会决定第一个项目便从村庄的环境卫生整治开始。由于村民环保意识淡薄，村庄内环境卫生状况较差，于是在Z公益基金会和村两委支持下，协会承办了“T村爱故乡环境整治项目”，拿出了可持续发展基金约6万元，在村子里安置了39个垃圾桶，建立了固定的垃圾投放点，绿化了丰荣书社广场，并积极链接政府、环保机构、园林设计师等资源，打造环保示范区域，大力度宣传环保知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民的环保意识。

后来，村庄还成立了T村爱故乡协会、T村民间理事会等，邀请T村德高望重的村民们来管理村庄的环境和文化等。这些村民自组织的成立既明确并聚焦了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参与村庄事务、共同决策的平台，

有利于增强村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推动村庄的自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同时，协会也能够整合村庄内外资源，关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村庄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2.美丽T村项目

由于过往村民的环保意识较为薄弱，村中的垃圾废料随意堆放，公共墙面的宣传图画虽多次更新，但村貌的整体改善仍迫在眉睫。为更好地改善生活生产环境，村民自发向T村社区大学工作人员表达了改造村貌的需求，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改造措施，不仅提升村庄的美观度，更增强居住的舒适度。于是，由Z集团资助启动资金，委托Z公益基金会进行项目管理，T村社区大学与T村村民携手共建，美丽T村项目就此开展。

项目的具体实施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主干道的绿化改造，改造方案根据道路边不同情况进行设计，如农户菜地采用自由式组合种植箱或条石等围合成花池种植果蔬、农户院墙可在块石上方或缝隙种植旱生植物或爬墙植物等，改造面积达到360平方米，为村庄增添了一抹绿色和生机。项目整合内部资源力量，与村民理事会配合筹款，调动低保户或五保户参与共建，同时联合社区大学、Z公益基金会和政府部门形成合力推动。紧接着是第二期的T村微彩绘项目，计划通过招募绘画艺术家和志愿者，对村庄的视觉环境进行美化，以艺术的形式激发村庄的活力。第三期的庭院微景观则通过比赛形式，吸引园林景观设计专业的学生参与，共同打造具有T村特色的庭院景观，进一步丰富村庄的文化生活。

随着项目的逐步实施，T村的环境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村民理事会和社区大学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筹款和共建方式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项目特别动员了低保户或五保户参与共建，不仅美化了村庄，还为村民提供了经济收益，也增强了村民的参与感和社区凝聚力，激发了村民的内生动力，促进了社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

2.池塘整治项目

在T村社区大学的所有项目中，池塘恢复项目是历时较久且意义重大的项目之一，也是T村社区大学在社区服务中因地制宜开展的项目。“T村”这一名字原是因村庄中有大大小小几十个池塘而得名，而大约三四十年前，有些村民开始把各种垃圾和土渣扔进去，填了几十年，有的成为了自家的菜园，有的甚至已经在上面盖了房子。2011年社区大学开展村庄环境调研的时候，发现村庄内大量的池塘和沟道被填埋，原本池塘的位置不是被占用，就是被水浮莲、芦苇、黑土、垃圾等占据，池塘之间不再有水系流动，变成一塘死水，恶臭连天。甚至有的沟道原本十米宽的水面，现在仅剩了不到一米。如此一来，村庄的排水和农业灌溉

都成为了问题。整个村庄尘土飞扬，空气质量很差，因为没有排水系统，村庄的防涝功能也受到了影响，一旦暴雨，村庄面临极大的洪涝风险。

2014年，在社区大学的引导下，村委欧书记提议并成立了T村民间调解委员会（也称为村民理事会）。书记邀请到村里最有威望的乡贤长辈担任民间调解委员会的会长，各个村小组能说的上话的60-70位村民为来担任委员，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协助村委处理村庄公共事务，他们主动承担起了沟通和协调的工作。东峽镇政府对此也大力支持，以镇政府的名义发布了“关于T村治理水系恢复工程的通告”。S公益发展中心负责提供资金，并按照一定的制度规范资金的使用，确保公开透明。而民间调解委员会就承担了其中签字确认并发布公示的责任。T村社区大学负责前期的动员签字和后期统筹组织开挖的工作，比如通知村民、村委的工作人员和所在村民小组内的调解委员会的委员来到开挖现场，在现场确认挖掘范围等。村委主要负责纠纷的处理，村委牵头，民间调解委员会承担日常的现场调解工作。2016年，终于完成了池塘的恢复和整治。

值得一提的是，在池塘整治恢复工程正式开工前，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每个村小组的负责人、T村民间调解委员会委员一起拿着征求意见书，就是否同意对个别村民非法填埋占用的沟道和池塘进行原状恢复的问题挨家挨户进行意见征求，让大家表达自己的态度并按上手印确认。最终，90%以上的村民把手印摁在了“同意”栏上。这样，很短的时间就做获得了开工的合法性，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做通所有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有发生一例冲突事件。“池塘恢复之后，整个村庄的环境变化很大，青山绿水，非常干净，空气也变得清新。垃圾全部清理之后，灰尘也变少了，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漫天尘土飞扬。水系连通之后，村民还可以有水灌溉，打农药也方便，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从家里挑井水去打。泄洪也很好用，像前几天的暴雨，旁边村子被淹了，T村没有被淹。”书记很高兴地说，同时也感慨到“池塘整治项目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如果没有大家的全力支持积极响应，这个事情很难做到。”

3.2.5 文化传承

1. “老宅新生”项目

在中国，众多历史悠久的老宅因缺乏必要的保护而逐渐消逝，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载体。虽然这些老宅没能与著名的自然景观或古迹相提并论，但对于T村的村民来说，它们是老一辈亲手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是心灵的港湾，是世代相传的家园。Z公益基金会看到了这些老宅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他们发起了“老宅新生”项目，旨在唤醒村民的保护意识，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

遗产。面对政策的限制和现代化的挑战，如何在保护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复杂问题。

“老宅新生”项目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活动和措施，引导村民重新发现老宅的价值，并激发他们采取行动保护这些历史遗迹。在明确目标和组建团队后，项目汇聚了设计师、摄影师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并进一步通过团队建设与专业培训，确保每位成员都具备必要的技能和保护理念，结合多方力量和理念进行实际的改造与活动组织，包括设计方案的讨论、老宅的修复、以及视频的剪辑制作，最终通过展览和聚会等形式，展示老宅的新面貌，增强村民对老宅的情感和认同。

在2016年8月18日至24日的一周集中活动中，21位设计师、志愿者与本地青年和建设者携手合作，成功地为老宅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老宅改造、文化展览、村民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保护了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老宅，促进了村庄的文化遗产，同时，它也激发了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意识，强调了青年下乡可以为乡村带来新思想和活力，而乡村则为青年提供了认识世界和自我成长的机会。

2.村志口述史项目

随着城镇化的浪潮不断推进，乡村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正逐渐消逝。T村的年轻一代纷纷涌向城市，方言和传统习俗也随之淡出人们的视线。面对这一挑战，社会组织深刻认识到，记录和保存村庄的口述历史对于维护村庄的历史和文化多样性至关重要。

为此，Z公益基金会委托人类学研究和口述史撰写的专业人士进行，通过深入田野调查和访谈，记录下T村村民的个人历史、家族故事和村庄的共同记忆。口述史工作人员深入村庄生活，与村民共同体验节气变迁和时节庆典，收集村民的口述资料，并将其编纂成《T村口述文化志》。这一项目不仅记录了村庄的人文历史和风俗习惯，还计划将这些资料整理出版，并制作纪录片，以更广泛地传播和保存村庄的故事。撰写一部口述史，并不只是写作，而是提供机会让不同的人能够共同参与，产生联结——让年长的村民回忆历史，分享经历，让年轻人看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的文化；未来，还可能会有都市人来参访，有社会资源的人来支持村庄的种种发展，带来村庄未来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村志口述史项目曾入选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第六届口述历史国际周的项目展示，村志口述史公益团队还获得了2020年上海社会组织公益创业大赛银奖。它能够记录和传承村庄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增强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收集村民的个人经历和见证，项目保存了村庄珍贵的记忆和故事，为年轻一代提供了了解村庄过去和学习前人智慧的途径。同时，口述史梳理的过程中也增强了

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激发村民对村庄发展的参与和思考，从而促进村庄的自我更新和进步。

3.3 本章小结

本章以社会组织在T村的实践为核心，系统梳理了T村的发展困境与社会组织的介入路径。T村作为东南沿海典型的空心化村庄，长期面临资源匮乏、人口流失、环境恶化、文化认同弱化及治理动力不足等多重挑战。尽管地理区位和历史文化积淀具备一定优势，但内生发展动力的缺失导致村庄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以Z公益基金会为核心的多元社会组织自2011年起，以“T村社区大学”为载体，以“文化入手、服务切入”为策略，通过教育赋能、文化激活、环境治理和社群培育等维度具体展开。

然而，社会组织在T村的实践参与有何效果？对于乡村内生动力有何作用机制？在实践中又是如何将外部资源输入转化为村庄自主发展能力的？接下来的第四章将进一步聚焦社会组织参与激发T村内生动力的实际效果，通过量化与质性分析，评估其在社区凝聚力提升、治理结构优化、文化资本激活等方面的成效，为乡村振兴中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镜鉴。

第4章 社会组织参与激发T村内生动力的效果分析

4.1 T村内生动力激发效果的评估方法

为进一步评估社会组织参与对于T村内生动力的激发效果，本研究借鉴以往学者对于“内生动力”的评价体系，发展制定适合测量T村内生动力效果的指标。正如前文所总结的，周迪针对“乡村内生动力”划分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发展意愿和客观发展能力两方面，主观发展意愿从村民的自我认知、自我效能、风险偏好和从众倾向四个维度来回答村民“想不想”发展的问题，客观发展能力从健康基础、技能运用和知识教育三个维度来回答村民“能不能”发展的问题。^[55]经实证数据检验，该评价体系具有较强的有效性。

基于此，本研究从“主观发展意愿”和“客观发展行为”两个维度构建内生动力测量体系。主观发展意愿维度依然包含自我认知、自我效能、风险偏好和从众倾向四个维度：自我认知体现村民对自身参与村庄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自我效能反映村民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判断；风险偏好衡量村民对外部要素的接受程度；从众倾向考察邻里带动对村民发展意愿的影响。修改后的客观发展行为维度包含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参与村庄自组织、参与村庄志愿服务、主动学习新知识四个具体维度。具体内生动力评估框架如图4-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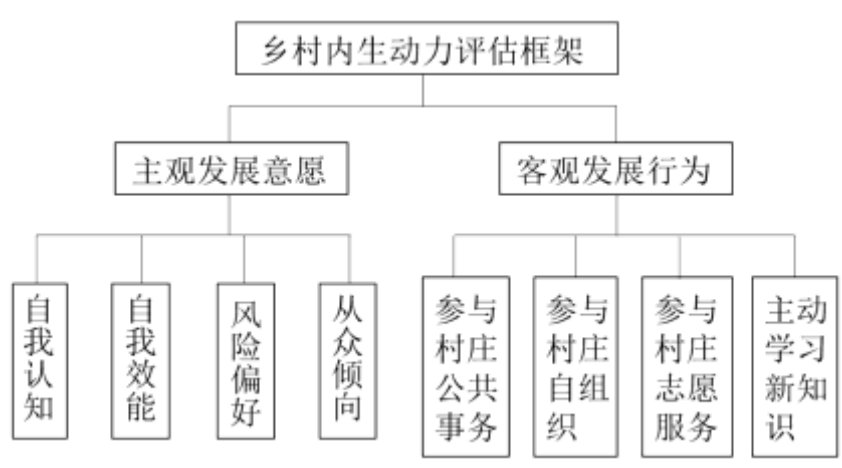


图4-1 T村内生动力评估框架

在此基础上，笔者多次前往莆田市T村进行实地调研，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T村和Z村开展问卷调查收集量化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同时，运用深度访谈的方式深入了解T村内生动力能够有效激发的原因。

4.1.1 问卷调查法

调查问卷包含一般人口学变量，以及依据以上制定的内生动力评估框架，针对每个评估维度的内涵分别设计了2-3个子问题。使用Cronbach's α 系数对问卷信度进行衡量，得出问卷Cronbach's α 系数为0.957 (>0.8)，表明问卷信度较好。使用KMO系数(Kaiser-Meyer-Olkin)对问卷效度进行衡量，问卷KMO系数为0.912 (>0.6)，表明问卷效度较好。所制问卷为实验组与对照组通用，问卷采用线下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

本研究在调查选取T村为实验组，选取隔壁村Z村为对照组。经笔者实地调研和当地相关部门提供的村庄资料显示，所选取的这两个村村情较为相似，都属于城郊结合部村庄，区别仅仅在于社会组织的介入与否，因此具备可比性。

表4-1 实验组和对照组基本情况

	实验组	对照组
到乡镇距离 (km)	3	3
人均耕地 (亩)	0.16	0.27
区划人口 (人)	4417	5306
常住人口 (人)	3460	4440
村民小组 (个)	8	13
男性占比 (%)	51%	50.5%
青壮年劳动力占比 (%)	52.7%	62%
集体经济收入 (万元)	12.27	11.51
回收问卷 (份)	113	64

如表4-1所示，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地理位置邻近，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较为接近，村庄的基础设施状况相当。实验组T村自2011年便有社会组织介入，而Z村在近年来未经任何外部干预。因此，对比检验两组村民的近期数据，即可呈现社会组织参与对于T村内生动力的激发效果。分别对两村村民开展问卷调查后，最终回收实验组问卷113份，对照组问卷64份，并使用SPSS26.0对所收集数据进行量化分析。问卷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在村庄生活20年以上，年龄主要集中在51-70岁，具体一般人口学情况如表4-2、4-3所示。

表4-2 T村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资料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8	42.5
	女	65	57.5
年龄	18-30岁	1	0.9
	31-50岁	22	19.5
	51-70岁	53	47
	70岁及以上	37	32.7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90	79.6
	初中	15	13.2
	高中/中专	7	6.2
	大专及以上	1	0.9
在本村生活年限	3年以下	0	0
	3-10年	4	3.5
	10-20年	7	6.2
	20年以上	102	90.3

表4-3 Z村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资料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0	46.9
	女	34	53.1
年龄	18-30岁	2	3.1
	31-50岁	20	31.3
	51-70岁	24	37.5
	70岁及以上	18	28.1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2	65.6
	初中	19	29.7
	高中/中专	2	3.1
	大专及以上	1	1.6
在本村生活年限	3年以下	1	1.6
	3-10年	1	1.6
	10-20年	5	7.8
	20年以上	57	89.1

4.1.2 深度访谈法

为更具体了解社会组织参与对于T村内生动力的激发效果及原因,笔者依据评估框架以及结合社会组织实践分别制定了访谈提纲对村书记、项目负责人、核心志愿者、乡贤代表等7人进行了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又补充访谈了Z基金会T村项目首任负责人(后任Z基金会理事长)以及第二任项目负责人、第三任项目负责人2人,并对访谈内容进行了整理归纳和质性分析。具体如表4-4所示。

表4-4 访谈对象及访谈概要

访谈对象	身份/职务	主要访谈内容
A	T村村委书记	在村委的工作经历,对T村社区大学成立的印象,社区大学对村庄的影响,以及社会组织参与村庄发展的效果等。
B	T村社区大学第三任负责人	在T村社区大学的工作经历,儿童相关项目的承担,与S公益发展中心合作的水塘项目,以及社区大学对村庄文化建设的影响等。
C	Q社工机构T村项目点负责人	“乐居T村”养老服务项目的情况,居民议事会的组织,志愿者的动员与激励等。
D	Z基金会T村项目第三任项目负责人	负责T村乡村发展项目,大学生交流活动的组织,社区大学转型及养老项目的调研等。
E	志愿者骨干、助老员、Q社工机构全职工作人员	作为志愿者的经历,社会组织对村庄带来的影响,村民公共参与度的提升,以及生日会等活动的反馈等。
F	志愿者骨干	
G	T村乡贤、S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	S公益发展中心的成立背景,池塘恢复项目的推动,奖教奖学、重病救治等公益活动的开展,以及对社会组织参与村庄发展的看法等。
H	Z基金会理事长、T村项目第一任项目负责人	T村社区大学、Z基金会、Q社工机构的在T村工作的历史脉络、工作内容、工作手法和工作理念,以及对T村项目的参与过程中对含Z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和村民和乡贤的观察,寻找内生动力的原因所在。
I	Z基金会T村项目第二任项目负责人	

4.2 T村内生动力激发效果的评估结果

最终纳入统计检验的样本量实验组113份,对照组64份,共计177份。问卷主要维度计分规则如下:常规题项实施正向计分法,选项A至E分别对应5-1分标度,数值越高表示内生动力越强,其中第21、24题采用反向赋分,第22、25

题按多选数量计分。

依据“所在村庄”这个二分变量，对两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可以比较其均值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显著，得到结果如表 4-5 所示。结果显示，21 个指标中仅有 3 个指标不具显著性，其他 18 个指标均产生了显著影响，表明不同村庄的调查对象，在内生动力各指标中呈现显著差异。

表4-5 所在村庄对内生动力各指标的影响情况

维度	T	P
我认为自己的参与对于村庄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4.056	<0.001
我认为村民的自主参与是村庄发展的核心动力	2.529	0.012
我愿意参与本村传统文化传承活动。	2.096	0.027
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时，我能够准确表达我的想法和需求。	3.044	0.001
我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村庄发展做出贡献。	2.377	0.009
我对村民自主解决村庄问题有信心。	2.727	0.003
我愿意尝试新的方法或技术来改善村庄发展。	3.025	<0.001
我对村庄引入外部资源（如企业，社会组织,政府项目）持欢迎态度	2.390	0.006
我愿意接受新的政策或改革措施，即使存在一定的风险。	1.465	0.095
如果其他村民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我也会主动参与。	2.828	0.001
我会因为邻居或朋友的参与而更愿意参与村庄活动。	4.289	<0.001
您认为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如何？	4.330	0.830
您是否会主动提出村庄发展的建议或创新想法？	-0.219	-0.049
过去一年中，您参与村庄活动的频率如何（包括但不限于文化娱乐活动、公共事务讨论、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	8.217	1.138
您是否了解村庄内的自组织？（如文艺队、志愿者队、可持续发展协会、民间调委会等）	4.737	0.960
您是几家自组织的成员？	0.738	0.093
您在自组织的角色是什么？	3.128	0.485
您是否积极参与村庄志愿服务？	4.404	0.831
您参与过几个志愿组织的活动	2.544	0.288
您参与过哪些村庄（包括但不限于村委和社会组织）组织的培训	4.206	0.418
在参与村庄事务中，您经常能想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想法吗？	2.533	0.461

4.2.1 主观发展意愿的转变效果

表4-6 主观发展意愿评估结果

维度	子问题	实验组	对照组	T
自我认知	自己的参与对于村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4.55	4.05	4.056***
	村民的自主参与是村庄发展的核心动力	4.40	4.11	2.529*
	我愿意参与本村传统文化传承活动	4.57	4.28	2.096*
自我效能	参与公共事务时能够准确表达我的想法和需求	3.93	3.41	3.044**
	我有信心经过努力为村庄发展做出贡献	4.06	3.73	2.377*
	我对村民自主解决村庄问题有信心	4.18	3.84	2.727**
风险偏好	我愿意尝试新的方法或技术来改善村庄发展	4.21	3.74	3.025**
	我对村庄引入外部资源持欢迎态度	4.79	4.47	2.390*
	我愿意接受新的政策或改革措施	4.09	3.87	1.465
从众心理	如果其他村民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我也会主动参与	4.27	3.75	2.828**
	我会因为邻居或朋友的参与而更愿意参与村庄活动	4.38	3.63	4.289***
主观发展意愿	以上各项的均值	4.32	3.88	3.966***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如表 4-6 所示，基于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可知，实验组在“主观发展意愿”各维度上的表现大部分显著优于对照组（ $p < 0.001$ ），表明 T 村内生动力激发措施有效促进了村民主观发展意愿的转变。

在主观发展意愿的 11 个指标中，仅有“我愿意接受新的政策或改革措施，即使存在一定的风险”一项指标不具显著性，猜想可能该指标涉及抽象的“风险”概念，受访者可能因缺乏具体政策案例而难以准确评估风险程度。在日常工作中，通常需要有一个角色转化政策语言为生活语言，因此当问卷中的风险未被具象化为经济成本、生活便利度变化等可感知维度时，个体的风险偏好差异可能被掩盖。另外，当个体可能在理性认知上认可改革必要性，又担忧潜在风险而产生情感规避时，就可能产生趋中性回答，导致数据分布扁平化。

在自我认知维度，实验组在“我认为自己的参与对于村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和“我认为村民的自主参与是村庄发展的核心动力”的得分分别高达 4.55 分（对照组 4.05 分）和 4.40 分（对照组 4.11 分），表现出实验组村民更认可自我参与对于村庄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村民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之一。在自我效

能维度，实验组对自身参与价值的认同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认为自己在村庄参与中能够准确表达需求和想法，也更有意愿和信心通过自身努力推动村庄发展。正是这种对村庄参与和村民关系的正向认知，以及对参与村庄治理的意愿和信心，构成了村民积极并有效参与村庄事务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整体得分上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该维度的绝对差距最小，这表明我国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战略等乡村工作的推广实施对村民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村民对于主体参与的意识存在普遍性。

在风险偏好维度，实验组对变革的接受度明显更高，对风险的抗压能力更强。在“我对村庄引入外部资源持欢迎态度”指标中，实验组的得分高达4.79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实验组对过往社会组织工作的认可；对照组该指标得分为4.47分，是该维度表现最好的指标，表明对照组同样认可社会组织之于乡村发展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工作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而在“我愿意尝试新的方法或技术来改善村庄发展”“接受新政策或改革措施”两个指标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得分也存在一定差距，实验组的村民更愿意尝试新方法和新技术，更能够接受新政策和改革措施。

在从众心理维度，社会示范效应的影响尤为突出，在“因邻居/朋友参与而更愿意参加活动”指标中实验组和对照组间的得分差异最大（实验组4.38分 vs 对照组3.63分），表明在实验组群体行为对个体意愿具有显著带动作用，而这种带动作用的关键在于村民间的联结和凝聚力更强，组织“规训”对于村民个体的作用更明显、更有效。

整体而言，实验组主观发展意愿均值达4.32分，较对照组3.88分高出11.34%，且大部分指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p < 0.05$ ），证实内生动力激发措施有效重塑了村民对自身角色、集体行动价值的认知体系。

4.2.2 客观发展行为的激活效果

表4-7 客观发展行为评估结果

维度	子问题	实验组	对照组	T
参与村庄公共事务	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	4.35	3.52	4.330***
	主动提出村庄发展的建议或创新想法	2.51	2.56	-0.219
	过去一年参与村庄活动的频率	2.49	1.35	8.217***
参与村庄自组织	了解村庄内的自组织	3.73	2.77	4.737***
	参与自组织数量	1.59	1.50	0.738
	在自组织中的角色	2.14	1.66	3.128**

续表4-7 客观发展行为评估结果

维度	子问题	实验组	对照组	T
参与村庄 志愿服务	积极参与村庄志愿服务	3.21	2.38	4.404***
	参与志愿组织活动数量	1.72	1.43	2.544*
主动学习 新知识	参与村庄组织培训	1.70	1.28	4.206***
	我在参与村庄治理中有创造性想法	3.66	3.20	2.533*
客观发展 行为	以上各项的均值	2.71	2.14	5.003***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表 4-7 呈现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客观发展行为的对比结果。统计数据显示，实验组在“客观发展行为”大部分指标上均呈现显著优势（ $p < 0.05$ ），验证了内生动力激发措施对村民实际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

在公共事务参与方面，实验组过去一年活动参与频率平均得分为 2.49 分（对照组 1.35 分），且主动提出发展建议的比例与参与积极性自评均显著更高。“实际上水塘项目社区大学起到的是穿针引线的作用，而具体的策略确实是和书记以及有影响力和决断力的乡贤一起商定并推进实施的。因为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是外来的，又比较年轻，所以在恢复水塘的整个过程中，哪一个阶段要怎么做，其实都是村民教的，主要出力的也是村民，社区大学并不是作为最主要的角色。”（2024 年 8 月 12 日访谈社区大学负责人 B）高频、主动参与活动及主动提出建议和想法，是村民资本在社区活跃的重要体现。

自组织参与维度中，实验组村民了解村庄内的自组织平均得分为 3.73 分（对照组 2.77 分），且实验组在组织中承担核心角色的比例更高，表明实验组村民在自组织参与中参与程度更为深入，自组织的发展更为成熟。据上一章节梳理 T 村社会组织实践可知，实验组在社会组织介入过程中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便是培育了多个能够自行进行常态化运作的村民自组织，其中以志愿服务队伍为典型。“目前 T 村有 4 支志愿服务队共 76 人，分别是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队 6 人，群芳志愿队 24 人，乐康使者志愿队 24 人，躬行大学生志愿服务队 22 人。”（2024 年 9 月 25 日访谈志愿者骨干 E）

在志愿服务与学习行为方面，实验组参与志愿组织活动数量及培训参与度均高于对照组，同时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不仅得益于村民村庄参与意识的提高，更在于社会示范效应下利他行为的传播，“志愿者是由社区组织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根据需要组织起来的，然后通过一带一的方式发展，现在村民志愿者 70 多个。”（2024 年 9 月 25 日访谈村委书记 A）

综合各维度数据，实验组客观行为均值（2.71 分）较对照组（2.14 分）高出 26.64%，其中“活动参与频率”（ $t=8.217$ ）、“了解村内的自组织角色”（ $t=4.737$ ）与“积极参与村庄志愿服务”（ $t=4.404$ ）三项的效应量最为突出。

4.3 本章小结

本章根据是否引入自变量对比 T 村和 Z 村的内生动力，对 T 村的内生动力的激发效果进行评估。基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构建包含 21 项指标的内生动力评估体系，涵盖主观发展意愿（自我认知、自我效能、风险偏好、从众倾向）与客观发展行为（公共事务参与、自组织参与、志愿服务、学习行为）2 个主要维度。问卷最终回收 177 份（实验组 113 份、对照组 64 份），经独立样本 t 检验验证所在村庄差异在内生动力得分上呈现显著性。

结果证明，T 村的内生动力效果显著优于 Z 村，也进一步说明自变量的引入，即社会组织的参与有效促进了 T 村内生动力的提高。

同时，深度访谈了村书记、社会组织负责人、志愿者等 9 人补充数据背后的社会机制与行为逻辑，并将在下一章进一步说明。

第5章 社会组织参与激发T村内生动力的原因分析

通过上一章节可知，社会组织的参与有效推动了T村乡村内生动力的激发，本章将基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结合T村实践案例，揭示社会组织以“外部触媒”的角色是如何促进乡村内生动力的恢复和发展，重构乡村发展的底层逻辑的。

5.1 T村社会组织参与的特点

社会组织在T村激活内生动力的核心逻辑在于形成了“建立信任—推动参与—赋能村民—孵化组织—构建认同”递进式作用链条，以下就从这五方面进一步揭示其深层动因。

5.1.1 构建长期信任，深耕在地元素

信任关系的构建是社会组织介入乡村的“破冰关键”，社会组织在T村能够有效激发内生动力，重要原因之一即是社会组织能够与在地村民、村委长期维持这种信任关系，并逐渐探索在地化元素，深入村庄的发展内核。

社会组织初进入T村时，以“社区大学”为载体落地T村，通过与村民打交道、入户走访等与村民熟悉，形成友好关系，并进一步通过“非威胁性服务”策略，例如开展扫盲班、文艺队伍、四点半课堂等低门槛活动的方式切入，大大规避了村民对“外来干预”的天然警惕。“村民不提防社区大学，因为他们不涉及利益分配，就像自家孩子来帮忙一样。”（2024年9月25日访谈村委书记A）这不仅得益于社会组织本身中立的第三方角色，更得益于社会组织以“服务者”的角色定位通过三类行动来强化信任：

（1）生活化互动

在早期的信任建立阶段，社会组织工作人员通过参与生活化的互动，来打破“外来者”身份隔阂。“在社区大学的工作中，非常主要的一项就是跟村民的互动，每天在村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村民骨干喝茶聊天，就是当朋友。”（2024年8月12日访谈社区大学负责人B）据社区大学负责人介绍，社区工作人员将与村民的日常交流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入户拜访、喝茶聊天是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走进村民内心的重要方式，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参与到村民的农事活动中，例如在农忙时一起去田里帮忙摘花生等等。这些生活化的互动及共同劳作的经历，既让工作人员亲身体验、熟悉村民生活，也能让村民看到他们的真诚和付出，感受

到工作人员并非高高在上的“外来者”，而是愿意与他们同甘共苦的伙伴，进而为长期信任关系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2）需求响应机制

社会组织以“社区大学”为外衣，以“社区服务”为本质，从文艺队组建到池塘恢复，服务项目均以村民需求为行动起点。“社区大学从不强推项目，总先问我们想要什么。”（2024年9月25日访谈志愿者骨干E）社区大学自2011年成立以来，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成为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举措。“当时村里很多老人家都是文盲的状态，既不识字，也不会说普通话。社区大学成立后开展的第一项活动就是扫盲班。”（2024年9月25日访谈村委书记A）通过初期的社区走访和地调研，了解到大家的文化限制，社区大学成立后开展的第一项活动就是扫盲班，帮助村里那代曾因“重男轻女”观念不得上学和曾经没有条件念书的众多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的妇女和老人有机会重新学习和提升文化知识，这一项目切实满足了T村村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也进一步村民感受到社会组织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同时，社区大学在组织各类文艺活动时也充分了解村民的兴趣方向，例如了解到村民对于村庄中特色莆田音乐“十音八乐”没落的惋惜，便应村民需求开展了十音八乐课堂，前后吸引了89名村民参与其中并最终发展形成稳定的十音八乐队伍，能够每周自发组织学习并进行村庄公益演出。“2011年社区大学成立后，开始办扫盲班和文艺队，腰鼓队和盘鼓队，还有十音八乐队和军乐队相继成立和常态化排练。儿童图书活动、四点半学堂和夏令营等活动也办起来了，这个过程中，社区大学一边调研需求一边开展工作的方式得到了村民的信任。”（2024年9月25日访谈村委书记A）广场舞队、腰鼓队的组建及儿童书屋、四点半课堂等活动的推进也是如此，这些活动切实回应了村民的需求，拉近了社会组织与村民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初步地将大家组织起来，为大家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平台。

此外，池塘恢复项目的推进，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组织与村民的信任关系。当有了一笔外来资金，社区大学在开展工作中，了解到村民对恢复水塘的需求最为迫切，于是积极推动该项目的进行。在项目实施前，社区大学做了大量的调研和沟通工作，挨家挨户走访村民，收集意见，让村民发表对恢复池塘的看法，并签字盖手印确认态度。“社区大学在水塘恢复工程正式施工之前，特地开展了全体村民关于此事的调研，让村民发表意见和想法，并且挨家挨户签字盖手印确认，是赞成还是反对还是弃权。”（2024年8月23日访谈社区大学负责人B）通过这种方式，社区大学充分尊重村民的意愿，让村民感受到自己的意见被重视。同时，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社区大学与村委、R集团、S公益中心等密切合作，

共同解决遇到的问题。如在资金方面，R集团愿意资助该项目，解决了资金难题；在协调村民利益方面，社会组织引导成立民间调解委员会，挖掘邀请村里品行正直、威信高的村民长者担任委员，陪同他们一起做通占塘村民的工作。这些实际行动让村民看到社会组织为村庄发展付出的努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加信任社会组织，愿意积极参与到项目中来，为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持。

（3）长期在地陪伴

社区大学自2011年成立以来，长期扎根汀塘村，连续多年在地办公，与村民、村委等形成了“半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组织在地化的信任积累使社会组织在后续治理冲突中具备调解位置和调解能力。

在水塘恢复工程这一关键事件中，社会组织的调解能力得到了充分体现。

“社区大学在水塘恢复工程正式施工之前，特地开展了全体村民关于此事的调研，让村民发表意见和想法，并且挨家挨户签字盖手印确认，是赞成还是反对还是弃权。最后收集到的情况是90%的村民赞成，7%-8%是弃权，2%-3%是反对的，反对的都是那些自己填土（盖房）的。”（2024年8月23日访谈社区大学负责人B）社区大学作为“中立第三方”，凭借与村民建立的坚韧的信任关系，带动村中有威望的村民骨干挨家挨户调查游说，深入了解村民的想法和需求，在村委与村民之间起到了良好的沟通桥梁作用。“当时一分地私下交易的金额是5万元。大家少的填了几分地，多的（填了）有几亩地，恢复池塘就让这些村民损失很大的经济利益。”（2024年9月25日访谈村委书记A）在涉及利益损失的情况下，如果由村委直接介入的话其实很大可能会引发村民的对抗情绪，而社区大学通过耐心的沟通和协调，成功完成90%村民签字，有效化解了潜在的矛盾冲突，推动了水塘恢复工程的顺利进行。这一事件印证了村民对社会组织的认可与信任。

社会组织在长期陪伴中积累的信任，为其调解治理冲突提供了独特优势。

“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过来入户走访，我们都感觉他们非常亲切，就像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所以村民们也都非常的热情。”（2024年9月25日访谈志愿者骨干E）如志愿者骨干提到的那样，村民对社区大学的信任源于其长期的服务和付出，源自前期一步一个脚印的关系建立，正是这种长期陪伴下建立的信任关系，使得村民在面对有损失风险时，愿意相信、支持社会组织，愿意接受外部资源和新政策，从而降低规避风险的心理。在水塘恢复工程中，社区大学之所以能够站在中立的立场，倾听村民的诉求、平衡各方利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获得村民的认可和支持从而有效调解冲突，正是其长期与村民、村委形成“半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成果体现。

5.1.2 搭建参与平台，孵化自治组织

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注重搭建村民多样化的、低门槛的参与平台，让大家都能够走出家门参与到组织当中，并在开展活动过程中逐步赋能村民主体，随后通过系统性策略，筛选出具有组织、协调能力的骨干，推动村民从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推动村民组织从松散到结构化发展，构建起了乡村内生动力的坚实载体。

（1）基础参与层：兴趣导向活动吸引村民参与

首先，社会组织是通过开展一系列兴趣导向活动，吸引村民走出家门，初步组织起来。“我在11年社区大学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志愿者了，最早是从打扫卫生开始。后来社区大学组织大家跳广场舞，还请来了大学生志愿者来当老师，我们就去参加活动咯。”（2024年9月25日访谈志愿者骨干E）“起初只是去凑凑热闹。”（2024年9月25日访谈志愿者骨干F）如访谈中志愿者骨干E和F所说的，社会组织在早期的服务开展中以趣味性、低门槛的文化活动为主。“他们跟我聊的时候就说，之前虽然是在一个村子，但是呢离得比较远，接触比较少，有时候见面虽然认得这个人是谁但是不会打招呼的。一起参加了文艺队或者其他什么活动之后就有了交集，这样私下也会有更多交流和互动。”（2024年8月23日访谈社区大学负责人B）社会组织通过广场舞、夏令营、腰鼓队、“村晚”等村民们喜闻乐见的活动，打破了邻里甚至村庄的隔阂，形成了初步的社区凝聚力，同时也为村民提供了轻松愉快的参与环境，让村民在享受活动乐趣的同时，逐渐与社会组织建立联系，也逐渐与其他村民有更多接触和组织活动。

其次，社会组织发现乡贤家属也是重要的骨干来源。由于乡贤对村庄有资源投入和奉献，在村庄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威望，乡贤家属也会因为他们对村庄的投入而关心村庄的发展，是潜在的村民骨干。因此，社会组织就动员乡贤家属参与到社会组织活动中，从而也带动更多资源和力量投入村庄。

T村社区大学还联合艺术团举办了第一届的乡村音乐晚会。在晚会上村民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参与了筹款与晚会的筹备，而且还积极参与到节目的编排和表演中，包括之前社区大学发展的十音八乐、军乐队、腰鼓队等都纳入了本次的表演节目。这是村民自主行动力发展重要的体现，社会组织希望借此机会，挖掘出村民更多的能力来共建村庄。

社会组织以这些文艺队伍为基础，逐步引导大家参与到村庄事务如环境整治等活动中，使村民从单纯的服务对象开始转变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通过密切联系这些群体，社会组织也能够识别出具有潜力的带头人，为后续的能力建设和组织发展奠定了基础。

（2）决策参与层：制度性平台赋予村民话语权

识别出潜在村民骨干后，社会组织会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能力建设，提升骨干的组织协调能力，其中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外出学习优秀经验。“社区大学会把村民骨干送去跟其他社区大学的伙伴和骨干一起交流互动。”（2024年8月12日访谈社区大学负责人B），通过这种交流学习，骨干们拓宽了视野，学习到了先进的经验和理念。“他们看到了人家村里有长者食堂，就非常希望自己村里也有一个。”（2024年8月12日访谈社区大学负责人B）这种交流互动会激发骨干们对村庄发展的新想法和新思路，社会组织也会进一步就他们的新想法引导他们考虑如何落地等。此外，社会组织还会邀请专家教授开展讲座，让骨干们接触到专业知识和前沿理论。在参与这些活动后，骨干们的组织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能够更好地承担起组织和领导工作，正如社区大学负责人所说的，“送骨干外出学习一下，回来就能独当一面”。

为了让这些骨干村民拥有实质话语权，也为了逐渐锻炼他们的决策能力，T村社区大学引导建立了可持续发展协会、Q社工机构引导建立了居民议事会等制度性平台，从最初议题驱动逐渐发展为常态化运作。“最早是因为村书记A希望村委跟村民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沟通的桥梁……于是Q社工机构以社会组织的身份发起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以茶话会的形式……后来这样的形式就成为了一种惯例延续下来。”（2024年10月16日访谈Q社工机构驻点负责人C）这便是居民议事会的由来。

在由Z集团捐赠的福寿金暂停发放时，议事会在处理村民情绪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村书记先在议事会上跟核心的骨干志愿者交代过，也向大家征求意见……通过这样的过程，统一大家的思想，整个氛围还是比较平和的，所以最后这件事情公布出去之后产生的震荡就会小很多。”（2024年10月16日访谈Q社工机构驻点负责人C）接受到从村书记传达消息至议事会核心成员后，由议事会的成员逐步向下做工作，最终获得了村民的理解，有效避免了村民因利益受损有可能引发的不良情绪和行为。这表明社会组织通过搭建这些制度性平台，为村民提供了能够参与到村庄重要事务讨论和决策中的机会，让村民真正拥有了话语权，从参与乡村建设的基础层面逐渐上升到决策层面。

社会组织巧妙地以茶话会这种非正式沟通的形式发起议事会，避免了传统会议的权威压迫感，让普通村民尤其是妇女、老人敢于发声，议题也从简单的路灯维修、水沟清理等公共事务，逐步延伸至长者助餐、池塘整治等村庄治理，村民们也逐渐认可和依赖议事会。在议事过程中，社会组织在前期主要提供资金、培训和技术支持，搭建基础框架；到了议事会逐渐成熟阶段，社会组织就逐步退出

直接管理，转为幕后支持。

（3）自主行动层：自组织实现自治和“裂变”

社会组织以项目制为驱动，促进了自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以十音八乐队为例，课堂开办后共有48名村民形成了稳定的十音八乐队，每周自发组织固定时间地点学习并进行村庄公益演出。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村民自行组建的军乐队，并经过一年的训练后运作顺利。

这些自组织可以实现活动策划、经费管理等全流程的自治，群芳志愿队是另外一个典型代表。群芳志愿队成员是“乐居T村”项目的志愿者，她们不仅服务于养老项目，还参与村庄其他活动的组织和实施，实现了自我管理和发展。

另外，志愿者队伍内部也形成了“一对一”的传帮带机制，即由第一批志愿者带动新成员的方式，形成梯队式发展。“Q机构社工先对第一批进行培训，到了下一次，这些有基础的志愿者会带动他们认识的其他人参与进来，再把这套流程传下去……这支志愿者队伍都是女性，所以大家给自己的志愿者队伍取了个名字叫群芳志愿者队。”（2024年9月25日访谈志愿者骨干E）

在访谈中，据志愿者骨干E介绍，目前村里有4支志愿服务队，一共是76个人，其中有21%的志愿者骨干具备独立运营活动的能力。“我们在培训志愿者的时候，就给他们说：每个人都是有潜能的，生命可以影响生命，每个人都可以为村庄做一些事情，每个人对村庄都有贡献。这样的话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了，他就有内生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感受到成就感和价值感，大家就会乐于参加议事会，所以每场次的活动志愿者都会自发的来完成，包括布置场地、采买零食水果、收拾场地，所以现在在村里办活动都是非常轻松的，不仅是议事会，连年度的嘉年华活动，都已经完全没有紧张感了。志愿者已经非常的靠谱，大家自己都会完成分工和补位。”（2024年10月16日访谈Q社工机构驻点负责人C）在社会组织培育下，志愿者队已能够自我服务并能够为他人服务。社会组织在T村建立的这种结对帮扶互助的养老机制，是由村庄60岁左右较年轻的长者作为助老志愿者，分组结对帮扶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或困难老人。并通过结对微信群对志愿者每次探访和帮扶进行记录和管理，通过每月一次的志愿者茶话会对志愿者及其服务进行指导和鼓励，通过每季度一次的“养老学院”志愿者培训提升志愿者服务技能和意识，通过志愿者嘉年华表彰积极志愿者，使志愿服务被看见和肯定，调动志愿者自主性和积极性。这种助老志愿者分组结对帮扶的方式便于操作，易于管理，加上志愿者茶话会、“养老学院”志愿者培训等完善的支持系统，以及嘉年华表彰带给志愿者的精神和物质鼓励，极大地激发了志愿者的热情。作为专业居家养老服务的有力补充，这种服务模式赋予了志愿者更多的自主性，社会组

织无需过度紧密介入和干预，这意味着即使在“乐居T村”项目因经费不足而发生变动的情况下，村庄内的互助养老模式仍能持续运转，保证老年人得到关爱和帮助。

这种自治模式体现了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自主行动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有助于降低村庄的治理成本，也正因为能够自我服务从而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当然这也进一步说明，乡村内生动力不是“唤醒”，而是通过可操作的参与机制设计“培育”出来的。其核心在于让村民在解决切身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形成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责任意识。

5.1.3 协同内外资源，构建社会资本

社会组织在协调资源时就像“翻译官”的角色，通过“资源转译”来实现内外资本的有效嫁接。这种协同机制促使村庄不单纯依赖外部输入，而是通过村民能力组织化、资金管理制度化等方式转向内源的可持续发展。

（1）资源识别：形成“需求—资源”精准匹配机制

社会组织注重对各类资源的识别与整合，形成“需求—资源”的精准对接。这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S公益发展中心成功将理事长G作为医生所拥有的专业判断能力，所掌握的医疗信息资源，和所链接到医疗资源和乡贤企业家提供的资金资源，对接村民所需要的重大疾病救助。

据S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G介绍，S公益发展中心由R集团老板（同样是乡贤）捐赠成立，这位老板正是理事长G关系很好的小学同学，大家长大后有所成就，就期望能为家乡贡献力量。同学聚会的聊天中，大家认为家乡恢复池塘、奖教奖学很有必要，R集团老板愿意出资助力乡村发展，就将钱交给他最信任的朋友也就是理事长G管理，但G觉得责任重大，希望资金能规范管理，最终与R集团品牌部商议后，在民政局注册成立了S公益发展中心，用于规范使用乡贤捐赠的资金。

“我因为在城里当医生的缘故，村里人进城看大病都过来找我，所以接触到了大量重病家庭（有重病救助）的需求，就推动R公益发展中心增设重病救治专项，刚好我那个好朋友（R集团老板）也愿意捐赠，就期望这个项目能为村民解决燃眉之急。”（2024年9月26日访谈S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G）理事长G从事医疗行业，熟悉相关医疗情况与信息，了解村民重病救治的真实需求，希望推动开展专业、规范的项目，为村民提供有效帮助。正好作为乡贤的R集团老板愿意捐赠，于是理事长G通过S公益发展中心，将乡贤的资金支持与村民重病救治的需求相结合，开展了重病救治专项。“我们（S公益发展中心）有制定了《大

病救助管理办法》，申请的话要提交一个是完整的病历，一个是费用清单，还有一个是村委会证明。”（2024年9月26日访谈S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G）为确保资源的公平和效率，S公益发展中心在专项中制定了管理办法，从而促进资源能与真正的需求对接，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一过程也充分体现了社会组织将外部资源转化为满足村庄实际需求项目的能力，通过建立这种有效的资源匹配机制，将分散的慈善资源转化为可持续服务项目，强化了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预期，为村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2）跨界整合：构建“五社联动”协作网络

在T村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组织构建了“五社联动”机制，实现了跨界资源的有效整合。以池塘恢复工程为例，R集团出资200万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T村社区大学充分发挥动员村民的作用，并组织村民参与项目实施，S公益发展中心则负责监管专项资金。“S公益发展中心的每一笔钱都是专款专用的……工程进度需要村里的老人会来督责监督，清单也需要几个老人共同签字。”（2024年9月26日访谈S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G）所在地政府也发布了《水系恢复通告》为该行为提供了合法性，这种“企业出资+乡贤协调+村民参与+第三方监督”的闭环模式，充分整合了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社区慈善、社区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实现了资源的跨界整合，有效推动了池塘恢复工程的顺利进行，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在养老项目中，Q社工机构也同样整合了多方资源，开发镇卫生院、医院、周边理发店、花店、照相馆等资源，为老人提供健康讲座、义诊、理发、生日礼花、寿星照等服务。“L集团和Z公益基金会负责提供资金，村委负责协调场地，妇女志愿者参与入户慰问、助餐煮饭和送餐、生日会煮饭和整理、传统节日活动开展等工作，男性长辈志愿者参与村民通知和发动、活动现场秩序维持等，暑假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来帮忙入户慰问和健康监测。”（2024年10月16日访谈Q社工机构驻点负责人C）据统计，2023年的助餐服务覆盖了87名高龄老人，助餐服务248人次，志愿者年均服务时长超1000小时。

“五社联动”机制通过跨界整合将社会资本从碎片化到系统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效能倍增，推动乡村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3）风险对冲：设立可持续发展机制

T村成功培育出乡村内生动力的原因，不仅在于外部资源的输入，更重要的是村庄内部形成了可持续发展机制，这种机制对外部输入的资源进行内部的规范化分配和常态化运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造血，从而增强村庄整体的抗

风险能力。

其一是构建了制度化的信任网络。以R公益发展中心为例，其建立了资金支出“三方联签”机制。“每笔支出都需要经过村书记、老人会长、监理工程师三方签字，然后把原始的凭证扫描上传到云端，这样乡贤就可以实时查看。”

（2024年9月26日访谈S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G）S公益发展中心也因此在这十年间实现资金使用的零挪用投诉，资金捐赠续约率也高达100%。这种透明化的资金管理制度，通过多方监督的形式，有效缩小了资金使用的腐败空间，同时也让捐赠方看到资金使用有迹可循，增强其对管理制度的信任，增强对乡村发展的信心，从而也进一步强化捐赠行为，形成资金的可持续。

其二是形成了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志愿者队伍中的形成的志愿服务“老带新”梯队。“现在的70名志愿者中，大概有35%是原来那些老志愿者的儿媳啦女儿啊，或者邻居之类的，一个带一个，志愿者队伍就越来越多人。”（2024年9月25日访谈志愿者骨干E）通过访谈资料可以推断，村庄中的强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流通的主渠道，这种由血缘和地缘构成的闭合性网络大大降低了信任成本。老志愿者们通过“一对一”的经验传授，让新志愿者习得了难以文本化的在地化服务技巧，也正是这种具身化的知识传递，使社区治理经验得以活态传承。另外，老志愿者在服务中积累的道德威望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情感债务，当他们的亲属加入时，既有的情感投资转化为新型成员的责任驱动力。这种非制度化的义务传递，实质上是差序格局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现代性转换。

通过构建可持续发展机制，T村对于信任链和关系网的立体编织，本质上重构了乡村社会的韧性基底——当资源分配机制、权力制衡体系与人力培育模式形成协同互构，村庄既能在风险冲击中维持基础功能稳态，又能通过内生资源的代谢更新实现发展动能转换，最终使外部援助从消耗性投入演变为触发内源变革的催化剂。

5.1.4 重塑文化认同，激活内生动力

T村的社会组织通过文化唤醒与机制创新，让文化认同成为内生动力的土壤，也动员起村民的主动参与来反哺文化传承，实现了“乡土公共性再造”，形成“认同—参与—再认同”的可持续循环。^[56]

（1）传统激活：传承非遗，增强代际文化纽带

在村庄开展工作初期，T村社区大学积极推动十音八乐非遗传承项目，有力地激活了村庄传统文化，增强了代际之间的文化纽带。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莆田市特色民间音乐，十音八乐曾经逐渐淡出T村人们的视线，一度面临失传

的危机，敏锐的社会组织在调研中发现了文化激活的可能性，回应村民的需求开办了十音八乐课堂，重新组织起了十音八乐队伍。十音八乐活动吸引了大量T村的主要群体——老年人的参与，使老年参与率大幅提升，十音八乐队伍的形成不仅传承了非遗文化，也让大家组成了常态化运作的自治组织，并在队伍成熟后成功衍生了军乐队、莆仙戏团等队伍。在十音八乐的传承过程中，不同年龄段的村民共同参与，形成了良好的代际文化纽带，年长者将自己对传统音乐的理解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年轻人则为传承注入新的活力，这种代际间的文化交流得以有效加强。为了让这些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光大，社会组织也注重搭建老少交流互动的平台，例如让小朋友们采访十音八乐队伍的爷爷，让他们在参与过程中，更加了解和认同本土文化，从而推动传统文化在代际间传承和发展。

（2）新文化建构：开展口述史项目，升华集体认同

T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沿海乡村，兼具着农耕文化和渔业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然随着现代化转型，T村里自古以来的石头房子逐渐被推翻重建，大部分的年轻人因常年在外越来越不熟悉村庄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2015年社区大学开始进行社区文化调研，覆盖乡村历史、习俗、建筑等各个方面，拟开展乡村口述史及村民记忆馆项目，希望接下来发动村民保护古厝，引导村民对本土文化的意识觉醒起到一定的基础作用。

口述史项目是社会组织重构村庄意义系统的重要举措。Z公益基金会委托人类学研究和口述史撰写的专业人士进行，采用文献整合、田野调查、口述记录的研究方法描述村庄的传统与现代，邀请年长的村民回想历史、分享经历，已深度采访约70位人物，310人次，收集了资料100余册，完成了田野手记四篇，并通过“T村故事”“人类学家的下午茶”“到T村做田野”“到T村做公益”等IP产出了20期内容，获得了社会关注，也吸引了村民的关注。

这个过程也让更多村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更加深入地了解村庄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脉络，也让村民的个体记忆得以被收集、整理，升华为集体认同的符号，凝聚成村庄的共同记忆和文化财富。此外，Z基金会引进了致力于乡土文化保育的公益组织Y文化团队与社区大学合作开展乡创项目“老宅新生”，项目招募了14名艺术创作者与村民一起，将T村的老石厝改造为村庄文化展示的空间，并邀请村民参与和担任志愿者，开展庆祝和茶话会。项目不仅引起了村民对乡村文化的关注，也使得大家开始重新审视村庄的文化，增强了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强化了集体认同。

（3）价值内化：树立荣誉体系，推动价值型参与

在管理志愿者队伍中，社会组织持续将“生命影响生命”的价值观传递给志

愿者们，并通过举办志愿者表彰、公益之星评选等形式，将“利他行为”融入村庄荣誉体系，促进了价值内化。“Q 社工机构会做志愿者表彰，登记志愿者服务时长，做得好的、服务时长多的，在年会上就有表彰，还有奖品，有荣誉证书……做志愿时就感觉想让老人快乐一点，有这样的责任感……”“在入户服务老人的时候，那些老人们就非常感激，会拉着我们手说感谢啊，其实就会让我们感到很有成就感。”（2024年9月25日访谈志愿者骨干E和F）村民志愿者在参与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能够给他人带来快乐和帮助，从而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这种认知转变使得村民将参与村庄事务视为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通过登记服务时长、颁发奖品和荣誉证书等方式，让志愿者的付出得到认可和奖励，也激励着更多村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通过这种价值逐渐推动村民从单纯的参与行为向价值型参与转变。

“Z 公益基金会建立了一个‘T 村大学生群’，80%受过奖学金资助的学生都参与过村庄服务。其中一个大学生还从夏令营学员成长为项目负责人，带动了22名大学生组建志愿服务队回馈家乡。”（2025年1月2日Z公益基金会员工D）基金会员工D提到“大学生以回村服务为荣”，这表明通过这些活动，回村服务、参与公益成为了大学生们追求的荣誉，当接受了村庄给予他们的支持和恩惠时，他们也发自内心地愿意参与到志愿服务中为村庄发展奉献力量。

在前期开展文化活动和价值塑造的基础上，村民对村庄文化认同的深化产生了“去工具化”效应，这种价值内化使得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动机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利益，而是更多地出于对村庄的热爱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这种观念的形成体现了“利他行为”已逐渐成为村民的价值追求，村民参与也从“计算型参与”逐渐向“价值型参与”转变。

社会组织成功激发T村的内生动力，还离不开村委的大力支持。在诸多项目推进过程中，村委积极配合社会组织，如在池塘恢复项目里，与社会组织、企业、公益中心等密切合作，共同解决资金、协调村民利益等问题，为项目顺利开展提供保障。而且，村委协助社会组织进行村民动员工作，助力各项活动和项目在村庄的推广。此外，村民自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家乡发展的责任感也是重要因素。村民积极响应社会组织的号召，主动参与各类活动，在自组织中承担工作，为村庄建设贡献力量，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社会组织的引导相互促进，共同推动T村内生动力的激发。这种多方协同机制也印证了张俊娜等学者的观点：“乡土公共性再造需外发促内生，更需党政搭台、社会唱戏、村民主演。”^[57]

5.2 基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的解释

基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社会组织在T村激活内生动力的实践呈现出“外部触媒催化—内外资源共振—在地系统重构”的动态逻辑。通过解构案例发现，社会组织通过三重机制突破传统外源发展模式困境，实现了“超地方要素”与“在地元素”的有机融合。

5.2.1 结构化嵌入：破解外源发展的“悬浮困境”

新内源性理论批判了传统外源模式中外部力量“悬浮”于乡村社会网络的问题。在T村，社会组织通过“双向转译机制”，实现了外部触媒的有效嵌入。

这种“双向转译机制”包含身份转译、需求转译和规则转译。身份转译是指社会组织在T村长达十多年的实践中，善用一些在地化的行动如“摘花生”“跳广场舞”等，来将自己“外来者”的身份逐渐转化构建“半熟人”式的关系网络，破解外来者身份隔阂。需求转译是指社会组织通过长期的在地化互动和陪伴，深入了解、融入了村庄并能够对T村进行需求的动态分析和转化，将模糊的需求具体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和可操作化的行动目标，以协调多元行动者达成共识并采取合作行动，在村庄建立了“服务者”身份的合法性。在池塘修复项目中，社会组织通过深度调研了解到村民有修复池塘的需求，在此基础上，社会组织进行资源链接，将资源与需求精准匹配。规则转译是指社会组织能够将外面的一些规则借鉴改造成为乡土规则。例如Q社工机构在志愿者管理和培育中形成了一种“一带一”的代际传递，大力推动了志愿者队伍的可持续；在修复池塘工程中，社区大学引入了项目管理制度，成立了民间理事会，但执行时采用“村民签字+乡贤见证”的乡土契约形式，成功动员了90%村民支持，形成“外部专业规范+乡土智慧”的混合制度，破解了科层制与乡土社会的制度摩擦。

T村的社会组织实践中，本质上是通过转译机制构建“地方性的发展界面”，在保持系统开放性的同时维系地方主体性。这种结构化嵌入不是简单的资源嫁接，而是通过知识再生产、制度创新与身份重构，形成具有自适应能力的发展生态系统。

5.2.2 协同式赋能：重构内外资源的互动范式

多个社会组织主体在T村的实践形成一种协同机制，是相互补充和高度配合的互动关系，这正是新内源性发展所强调的内外资源的“化学反应”而非仅是简单叠加。

作为核心组织的社区大学，担任着村民赋能者、资源整合者的角色，通过扫

盲班提升了村民文化水平，组建十音八乐队、广场舞队等文艺组织，增强了村民间的凝聚力，又以四点半课堂、夏令营等儿童活动培养儿童能力，间接带动其家庭参与社区事务，在此基础上，推动文艺队的成员成为最早一批的志愿者队伍。在水塘恢复项目中作为中立第三方，组织村民调研、协调利益，推动90%村民签字支持，化解村委直接介入的矛盾。作为专业服务主体的Q社工机构，扮演着组织孵化器、养老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在社区大学组建的兴趣社群和志愿者骨干基础之上，社工机构进一步培育志愿者自组织，引导议事机制的形成，将娱乐逐渐转向治理功能，推动T村养老服务的可持续。Z公益基金会和S公益发展中心则主要承担的是资金提供者、管理者的角色，通过资金注入激活内部项目和内部组织的运作，同时建立透明监管机制，确保资源有效转化。

不同社会组织主体的配合，形成了“五社联动”架构，包含社区村民、社工、社会组织、社区慈善、社区志愿者协同解决村庄公共问题的模式。

5.2.3 文化再生产：激活内生动力的深层密码

新内源性理论强调文化认同的“黏合剂”作用，尤其强调在地化文化的挖掘和升华。T村内生动力的有效激发正是以文化为线索的。

社会组织通过三重文化策略重构村庄意义系统。一是早期的传统文化动员，是指社区大学进入初期开展的扫盲班、十音八乐队伍、腰鼓队、广场舞队等为大家参与从家里走到村庄提供了契机，为后续提升村民骨干能力和参与村庄治理奠定了基础。二是集体认同的升华，是指在2019年开展的口述史项目，通过对多位村民进行深度访谈，并邀请年轻村民作为翻译志愿者参与访谈，以及撰写内容和传播的过程中，将村庄中的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认同符号，为大家的村庄归属感提供了情感载体。三是新价值的建构，即是通过志愿者的发动、鼓励、培训和表彰等，将利他行为纳入村庄荣誉体系，将发展话语转化为“守护家乡”“集体荣誉”等地方性叙事，这种价值重构打破了传统乡村“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单一评价体系，将村民对公共事务的贡献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承的精神财富，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以“代际效应”形成乡村内生动力的长效机制。

综上，社会组织在T村的实践是通过“外源激活—内生响应—系统自治”的演化路径，为新内源性发展理论提供了中国情境下的实践注脚，证明社会组织可通过“嵌入式创新”促成乡村从“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的范式转型。

5.3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系统阐释了社会组织参与激发T村内生动力的

实践逻辑与深层动因。5.1节通过“建立信任—推动参与—赋能村民—孵化组织—构建认同”的递进式分析，揭示了社会组织激活内生动力的具体策略；5.2节则从理论层面解构这一过程的动态逻辑，说明社会组织如何通过“结构化嵌入—协同式赋能—文化再生产”突破传统外源干预困境，实现内外资源的有机融合。两节内容形成“实践呈现—理论解释”的互证关系，共同印证社会组织作为“外部触媒”在重构乡村发展底层逻辑中的关键作用。

从实践路径看，社会组织在T村的参与呈现出系统性特征。首先，以长期在地化行动构建信任网络，通过生活化互动、需求响应和在地陪伴打破“外来者”身份壁垒，为后续治理行动奠定社会基础；其次，搭建“兴趣活动—制度平台—自组织”三级参与体系，以低门槛活动吸引村民参与、以议事会赋予话语权、以项目制推动自治能力孵化，逐步实现村民从“旁观者”到“治理主体”的转变；再次，通过精准匹配资源、跨界整合网络和可持续发展机制，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内生动力，构建起“五社联动”的协同治理格局；最后，以非遗传承、口述史项目和荣誉体系重塑文化认同，推动村民参与从“利益驱动”转向“价值内化”，形成“认同—参与—再认同”的良性循环。

新内源性发展理论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学理解释。社会组织通过“结构化嵌入”破解外源干预的悬浮困境，以身份转译、需求转译、规则转译构建“地方性发展界面”；通过“协同式赋能”重构内外资源互动范式，使社区大学、社工机构、公益基金等多元主体形成功能互补的“五社联动”网络；通过“文化再生产”激活内生动力深层密码，将传统文化、集体记忆与新型价值观转化为乡村发展的精神纽带。这种“外源激活—内生响应—系统自洽”的演化路径，既验证了社会组织作为“触媒”的催化效能，也揭示了乡村内生动力培育的底层规律——当外部力量通过系统化策略与在地元素深度融合时，能够触发村民主体意识觉醒、自组织能力成长和文化认同重构的连锁反应，最终推动乡村从“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的范式转型。

T村实践表明，社会组织激发内生动力的核心在于通过“嵌入式创新”重构乡村发展的社会基础：既需要以长期在地陪伴消解外来干预的排异反应，更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将外部资源转化为村民可感知、可参与、可掌控的发展动能。这种以村民为主体、以文化为纽带、以可持续机制为保障的治理模式，为新内源性发展理论提供了中国情境下的鲜活注脚，也为乡村振兴中社会组织参与路径的优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总结

本研究针对莆田市 T 村开展案例研究,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社会组织参与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效果及原因。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参与对 T 村乡村内生动力的激发效果显著。对 T 村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社会组织参与使 T 村村民在主观发展意愿和客观发展行为上均有积极转变。在主观方面,村民自我认知、自我效能提升,对风险的接受度提高,从众参与意愿增强;客观上,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自组织、志愿服务更为积极,主动学习新知识的行为也明显增多。

社会组织在 T 村激活内生动力遵循“建立信任—推动参与—赋能村民—孵化组织—构建认同”的逻辑。通过生活化互动、需求响应机制和长期在地陪伴构建信任;以兴趣导向活动、制度性平台和自组织发展推动村民参与并赋能;借助资源识别、跨界整合和可持续发展机制协同内外资源;从传统激活、新文化建构和价值内化重塑文化认同,实现“认同一参与一再认同”循环。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来看,社会组织通过结构化嵌入、协同式赋能和文化再生产三重机制,突破传统外源发展模式困境,实现“超地方要素”与“在地元素”融合,推动乡村从“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转变。

T 村社会组织的参与实践揭示了乡村内生动力的激活机制,其核心在于社会组织通过“嵌入式创新”重构乡村发展的社会基础。这种创新并非简单的资源输入或技术移植,而是以系统性的策略逐步推动外部要素与乡土逻辑的深度融合。研究发现,社会组织通过三重递进机制完成这一过程:第一,社会关系重构。社会组织以长期在地化行动构建“半熟人社会”网络,通过生活化互动如参与农事、茶话会等,及非威胁性服务如开展扫盲班、文艺队等消解村民对外来干预的排异反应,形成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积累。第二,制度逻辑转化。社会组织将外部资源转化为符合村庄运行规则的内生机制,例如通过“需求—资源”精准匹配、规则转译和可持续发展设计,使外部支持内化为村民可感知、可参与、可掌控的发展动能。第三,文化认同再生产。社会组织以非遗传承、口述史项目重构村庄集体记忆,并通过荣誉体系将利他行为纳入乡土价值系统,推动村民参与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形成“认同一参与一再认同”的闭环。

T 村社会组织的参与实践过程印证了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的核心命题,即乡村

发展需通过外部触媒激活内部潜能。但与经典理论相比，T村实践进一步揭示了三方面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其一，治理效能依赖于“五社联动”的协同网络，社会组织并非孤立行动者，而是通过与村委、乡贤、村民自组织形成功能互补的治理联盟，实现资源整合与权力制衡；其二，文化认同是内生动力的深层密码，社会组织通过激活传统文化符号和建构新型集体记忆，使发展实践嵌入乡土意义系统，破解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空心化”困境；其三，可持续性源于制度与关系的双重韧性，社会组织通过代际传递、差序格局转换和风险对冲机制，构建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内生治理结构。

6.2 启示与建议

6.2.1 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启示

社会组织应重视信任关系构建，深入乡村实际，了解村民需求，以低门槛服务活动为切入点，持续提供符合村民需求的服务，维持与村民、村委的长期信任，为后续工作开展奠定基础。要搭建多样化参与平台，设计趣味性、低门槛的活动吸引村民参与，挖掘潜在骨干并通过培训、学习交流提升其能力，建立制度性平台赋予村民话语权，推动自组织自治发展，培育村民治理主体意识。在资源整合方面，社会组织需精准识别资源，构建“需求—资源”匹配机制，积极开展跨界合作，形成“五社联动”等协作网络，并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规范资源管理，促进社会资本代际传递。注重文化建设，传承和创新乡村文化，通过开展文化活动、口述史项目等增强村民文化认同，将参与行为与荣誉体系挂钩，推动村民从计算型参与向价值型参与转变。

6.2.2 对乡村振兴实践的建议

地方政府应制定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在资金、场地、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乡村发展。村委要积极配合社会组织工作，协助开展村民动员、项目协调等工作，发挥自身在村庄治理中的基础作用，与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持续加大对乡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投入，提升村民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社会组织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增强乡村发展的内生基础。

6.3 研究贡献

本研究深化了对社会组织在乡村社区治理中角色和功能的理解，揭示了其激

发乡村内生动力的作用机制，丰富和完善了农村研究和社会组织研究相关理论，拓展了新内源性发展理论在乡村振兴领域的应用场景，为该理论提供了中国情境下的实践案例支撑。具体来说，本文在理论框架、分析维度和实践机制三个层面有所创新，能够为当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内生动力相关研究提供补充和借鉴：

（1）理论框架的整合性创新

现有内生动力相关研究多将乡村内生动力简化为“主体意识”或“治理能力”的单一层面，存在主客观维度割裂的局限，本文构建了“意识觉醒-行为激活”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将内生动力划分为四大意识维度（自我认知、自我效能、风险偏好、从众倾向）与四大行为维度（公共事务参与、自组织发展、志愿服务、主动学习），形成包含21项指标的评估体系。并通过定量分析与质性研究，揭示了主体意识是行为转化的核心驱动力。相较于周迪（2022）等学者侧重经济理性的内生动力测量体系，本研究创新性地纳入文化认同与价值内化等非经济变量，拓展了新内源性发展理论中“社会资本”的内涵边界。^[58]

（2）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的机制深化

针对新内源理论中“内外要素互动”的模糊表述，本研究通过T村13年实践提炼出结构化嵌入、协同式赋能和文化再生产三重机制，将宏观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微观路径。结构化嵌入通过身份转译、需求转译、规则转译，构建了外部触媒与乡土在地的适配链接。协同式赋能则超越了资源的简单叠加，以“五社联动”的治理网络推动外部资源与本土治理资源进行化学反应，补充了新内源理论中“多元主体协同”的作用细节。文化再生产则根据T村实践案例中的非遗激活、记忆建构和价值内化，发现文化认同是转化为内生动力的深层密码，填补了新内源性理论在文化维度的欠缺，丰富了新内源性理论。

（3）方法论层面的复合创新

现有乡村治理研究多依赖定性描述或单一量化分析，难以验证因果关系。本研究选取基础条件相似但无社会组织介入的Z村作为对照，通过对问卷数据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T村在内生动力的18项指标上显著优于Z村，通过实证数据证明社会组织参与对内生动力的激发效果。这种准实验设计为社会组织参与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明。此外，本文深度追踪T村13年的实践和发展，立足较长的时间周期描述了T村从外部输入到内源响应，再到系统自洽的发展链条。这种质性研究的理论饱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量化研究对动态机制解释的不足。

综上，本文在理论层面上将新内源发展理论从西方“要素互动”的宏观叙事，转化为中国乡村具体的本土实践逻辑，丰富了理论的适用场景和解释力，推动了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的本土化进程。在实践方面，本文梳理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的

具体行动并提炼了关键策略，为相关实践提供了“触媒激活”模式的参考。

6.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仅选取莆田市 T 村作为单一案例，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未来研究可增加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村庄的案例，对比分析社会组织在不同情境下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差异，提高研究结论的通用性。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在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主观性。后续研究可引入更多元的研究方法，如大数据分析、实验研究等，更全面、客观地评估社会组织参与效果。受研究时间和资源限制，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期动态影响关注不足。未来可开展跟踪研究，持续观察社会组织参与后乡村内生动力的变化趋势，以及乡村社会的长期发展效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更具时效性和前瞻性的建议。

参考文献

- [1] 求是网.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25)[2025-03-10].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10/25/c_1129079926.html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J]. 中国农业综合开发, 2021(05): 4-11.
- [3] 中国政府网. 民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EB/OL].(2022-02-15)[2025-03-09].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01/content_5676306.html
- [4] 中国政府网. 国家乡村振兴局. 民政部关于印发《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EB/OL]. (2022-05-07)[2025-03-09].
<https://app.www.gov.cn/govdata/gov/202205/24/485296/article.html>
-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131
- [6] 任剑涛, 姜晓萍, 贺雪峰, 等. 乡村治理现代化(笔谈一)[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8(1): 1-23.
- [7] Liu P, Han A. The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and their synergy in rural revitalization[J].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25. DOI:10.1007/s10668-025-06001-0.
- [8] Atterton J, Thompson N. University engagement in rur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northern rural network[J]. Journal of Rur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10, 5(3): 123-132.
- [9] Chirwa T G, Odhiambo N M.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a Critical Review[J]. Comparative Economic Research, 2018, 21.
- [10] Wu B, Pretty J. Social connectedness in marginal rural China: The case of farmer innovation circles in Zhidan, north Shaanxi[J].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04, 21(1): 81-92.
- [11] Jacques O, Olivier, et 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ident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76(2): 356-370.
- [12] 马荟, 庞欣, 奚云霄, 等. 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20(03): 28-41.
- [13] 陈娴, 刘俊锋. 新内源式发展视角下乡村产业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探析[J]. 农业工程技术, 2024, 44(26): 115-116.
- [14] Sabine M, Samuel 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Swiss mountain communities[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1, 21(3): 236-242.
- [15] 李怀瑞, 邓国胜.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新内源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四个个案的比较[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5): 15-22.

- [16] Zhang W, Yuan Y.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suburban area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9 villages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50(06): 133-143.
- [17] Ray C. Cultu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rritorial Rural Development[J]. Sociological Ruralis, 1998(1): 3-20.
- [18] Bosworth G, Atterton J. Entrepreneurial in-migration and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J]. Rural Sociology, 2012, 77(2): 254-279.
- [19] LIU P, HAN A. The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and their synergy in rural revitalization[J/OL].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25. DOI:10.1007/s10668-025-06001-0.
- [20] Georgios C, Nikolaos N, Michalis P.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A path toward reviving rural Europe[J]. Rural Sociology, 2021, 86(4): 911-937.
- [21] Zhang Y, Zhang L. A study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 A case study based on Y village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19, 21(5): 497-504.
- [22] 张文明, 章志敏. 资源·参与·认同: 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 社会科学, 2018(11): 75-85.
- [23] 张文明, 章志敏. 资源·参与·认同: 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 社会科学, 2018(11): 75-85.
- [24] 仝志辉, 杨润峰, 罗建章. 乡村特色产业的嵌入式内源发展路径——以四川省石棉县坪阳合作社黄果柑产业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8): 31-43.
- [25] 武小龙, 曾颖. 数字乡村社会秩序构建的机理、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的解释视角[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5): 31-40.
- [26] 苏毅清, 邱亚彪, 方平. “外部激活+内部重塑”下的公共事物供给: 关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机制的解释[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2): 72-89.
- [27] 邓崧, 龚伟. 中国数字乡村政策 LDA 量化分析——基于政策工具与动力视角的二维分析框架[J/OL].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1-14[2025-04-29].
- [28] LIU P, HAN A. The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and their synergy in rural revitalization[J/OL].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25. DOI:10.1007/s10668-025-06001-0.
- [29] 王兰. 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实践——以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区为例[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04): 65-74.
- [30] 章志敏, 张文明. 农村内生发展研究的理论转向、命题与挑战[J]. 江汉学术, 2021, 40(02): 5-15.
- [31] Ray C. Culture Economies[R]. Newcastle: 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Newcastle University, 2001.
- [32] Gorlach T A.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the Revalidation of Local Knowledge[J].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2007(160): 481-497.

- [33] 李怀瑞, 邓国胜.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新内源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四个个案的比较[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5): 15-22.
- [34] 王玉娟. 基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的传统农业区村落转型发展及其优化调控[D]. 南京师范大学, 2020.
- [35] 刘旭冉, 孙超.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内生动力提升[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6): 51-59.
- [36] 黄家亮. 赋利赋权赋能: 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动力再造[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02): 97-104.
- [37] 吴大兵. 当前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存在的三重困境与破解路径[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2, 24(06): 57-65.
- [38] 李培林. 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 内生动力和路径选择[J]. 社会学研究, 2023, 38(6): 1-17.
- [39] 刘晓雯, 李琪. 乡村振兴主体性内生动力及其激发路径的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8): 8.
- [40] 刘旭冉, 孙超.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内生动力提升[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6): 51-59.
- [41] 张晨, 肖大威. 从“外源动力”到“内源动力”——二战后欧洲乡村发展动力的研究、实践及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 35(06): 45-51.
- [42] 彭小兵, 彭洋. “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发展路径研究——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1, 20(03): 420-428.
- [43] 王志章, 薛人铭. 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培育路径研究[J]. 贵州省党校学报, 2021, (05): 72-83.
- [44] 文丰安.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重要性、动力及促进机制[J]. 东岳丛刊, 2022, 43(03): 5-15.
- [45] 周迪, 陈明成, 邱铭坚. 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与返贫风险——来自广东省相对贫困村的微观证据[J/OL]. 财经研究, 2022, 48(08): 48-62.
- [46] 胡炎平, 姜庆志, 谭海波.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村多元精英合作治理——以江门市农村联谊会为考察对象[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 (8): 73-77.
- [47] 蔡斯敏.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2(05): 115-119.
- [48] 于健慧.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 功能、挑战、路径[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9(06): 18-24.
- [49] 彭世钦. 外源性社会组织何以推动乡村治理——基于宵山乡建组织的个案研究[D]. 厦门大学, 2021.
- [50] FRIEDMANN H. FARMING WOMEN - GENDER, WORK AND FAMILY ENTERPRISE - WHATMORE S[J].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992, Vol.19(2): 375-378.
- [51] 于健慧.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 功能、挑战、路径[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9(06): 18-24.

- [52] 熊艳兵. 我国当代乡村社会组织发展研究[D].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61-89.
- [53] Steiner A, Atterton J. Explor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ural enterprises to local resilienc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5, 40: 30-45.
- [54] Morrison T H, Wilson C, Bell M. The role of private corporations in region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governance of housing and land us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 28(4): 478-489.
- [55] 周迪, 陈明成, 邱铭坚. 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与返贫风险——来自广东省相对贫困村的微观证据[J/OL]. *财经研究*, 2022, 48(08): 48-62.
- [56] 张俊娜, 江丽丽, 吴瑞. 汀塘村的乡土公共性再造[J]. *海峡通讯*, 2015, (08): 52-53.
- [57] 张俊娜, 江丽丽, 吴瑞. 汀塘村的乡土公共性再造[J]. *海峡通讯*, 2015, (08): 52-53.
- [58] 周迪, 陈明成, 邱铭坚. 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与返贫风险——来自广东省相对贫困村的微观证据[J/OL]. *财经研究*, 2022, 48(08): 48-62.

附录 A 调查问卷

尊敬的受访者：

您好！我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在读研究生，目前正在做关于社会组织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效果研究。问题回答没有对错之分，请您如实回答即可。我们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一章第九条和第三章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绝对保密。请您放心回答，感谢您的参与！

一、基本信息

1. 性别：

A. 男

B. 女

2. 您所在的村庄：

A. T 村

B. Z 村

3. 年龄：

A. 18 - 30 岁

B. 31 - 50 岁

C. 51 - 70 岁

D. 70 岁以上

4. 教育程度：

A. 小学及以下

B. 初中

C. 高中/中专

D. 大专及以上

5. 在本村生活的年限：

A. 3 年以下

B. 3 - 10 年

C. 10 - 20 年

D. 20 年以上

二、主观发展意愿

（一）自我认知

6. 我认为自己的参与对于村庄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 A. 非常同意
- B. 比较同意
- C. 一般
- D. 不太同意
- E. 完全不同意

7. 我认为村民的自主参与是村庄发展的核心动力。

- A. 完全同意
- B. 比较同意
- C. 一般
- D. 不太同意
- E. 完全不同意

8. 我愿意参与本村传统文化传承活动。

- A. 非常同意
- B. 比较同意
- C. 一般
- D. 不太同意
- E. 完全不同意

（二）自我效能

9. 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时，我能够准确表达我的想法和需求。

- A. 非常同意
- B. 比较同意
- C. 一般
- D. 不太同意
- E. 完全不同意

10. 我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村庄发展做出贡献。

- A. 非常有信心
- B. 比较有信心
- C. 一般
- D. 比较没信心
- E. 完全没信心

11. 我对村民自主解决村庄问题有信心。

- A. 非常有信心
- B. 比较有信心
- C. 一般
- D. 比较没信心
- E. 完全没信心

（三）风险偏好

12. 我愿意尝试新的方法或技术来改善村庄发展。

- A. 非常愿意
- B. 比较愿意
- C. 一般
- D. 不太愿意
- E. 非常不愿意

13. 我对村庄引入外部资源（如企业、社会组织、政府项目）持欢迎态度。

- A. 非常欢迎
- B. 比较欢迎
- C. 一般
- D. 不太欢迎
- E. 完全不欢迎

14. 我愿意接受新的政策或改革措施，即使存在一定的风险。

- A. 非常愿意
- B. 比较愿意
- C. 一般
- D. 不太愿意
- E. 非常不愿意

（四）从众倾向

15. 如果其他村民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我也会主动参与。

- A. 非常同意
- B. 比较同意
- C. 一般
- D. 不太同意
- E. 完全不同意

16. 我会因为邻居或朋友的参与而更愿意参与村庄活动。

- A. 非常同意
- B. 比较同意
- C. 一般
- D. 不太同意
- E. 完全不同意

三、客观发展行为

（一）参与村庄公共事务

17. 您认为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如何？

- A. 非常高
- B. 较高
- C. 一般
- D. 较低
- E. 非常低

18. 您是否会主动提出村庄发展的建议或创新想法？

- A. 经常提出
- B. 比较经常提出
- C. 有时提出
- D. 偶尔提出
- E. 从未提出

19. 过去一年中，您参与村庄活动的频率如何（包括但不限于文化娱乐活动、公共事务讨论、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

- A. 每周 1 次及以上
- B. 每半月 1 次
- C. 每月 1 次
- D. 每季度 1 次
- E. 很少参与

（二）参与村庄自组织

20. 您是否了解村庄内的自组织？（如文艺队、志愿者队、可持续发展协会、民间调委会等）？

- A. 非常了解
- B. 比较了解
- C. 一般

D. 不太了解

E. 非常不了解

21. 您是几家自组织的成员？

A. 0

B. 1

C. 2

D. 3

E. 4 家及以上

22. 您在自组织的角色是什么？（可多选）

A. 发起人之一

B. 核心骨干

C. 普通成员

D. 只是偶尔参与活动

E. 算不上成员

（三）参与村庄志愿服务

23. 您是否积极参与村庄志愿服务？

A. 非常频繁参与

B. 比较频繁参与

C. 一般

D. 不太参与

E. 完全不参与

24. 您参与过几个志愿组织的活动？

A. 0

B. 1

C. 2

D. 3

E. 4 及以上

（四）主动学习新知识

25. 您参加过哪些村庄（包括但不限于村委和社会组织）组织的培训？（可多选）

A. 扫盲培训（识字、普通话等）

B. 志愿者培训

C. 文艺类培训（舞蹈、合唱、乐器等）

D. 生产技能培训

E. 没有参加过培训

26. 在参与村庄事务中，您经常能想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想法吗？

A. 非常同意

B. 比较同意

C. 一般

D. 不太同意

E. 完全不同意

附录 B 访谈人员名单

附表 B-1 访谈对象

序号	所属组织	受访者	访谈时间
1	T 村	T 村村委书记	2024 年 9 月 25 日
2	T 村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第三任负责人	2024 年 8 月 12 日 2024 年 8 月 23 日
3	Q 社工机构	T 村项目点负责人	2024 年 10 月 16 日
4	Z 基金会	Z 基金会员工、T 村项目第三任负责人	2025 年 1 月 2 日
5	T 村	志愿者骨干、助老员、Q 社工机构全职工作人员	2024 年 9 月 25 日
6	T 村	志愿者骨干	2024 年 9 月 25 日
7	T 村	T 村乡贤、S 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	2024 年 9 月 26 日
8	Z 基金会	Z 基金会理事长、T 村项目第一任负责人	2025 年 3 月 8 日
9	Z 基金会	Z 村项目第二任负责人	2025 年 3 月 8 日

致 谢

踏入清华园求学，是我人生中至为幸运的旅程，而这一路，承蒙太多人的关爱与帮助，心中满是感恩，难以尽述。

感恩我的父母，徐开明先生与胡长梅女士。退休之后，他们不远千里来到我家，不辞辛苦，全心全意照顾我的两个孩子。母亲曾是中学语文教师，家中满溢的书香与她边教书边自考的勤奋身影，自儿时起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母亲始终是我前行路上的灯塔。还有我的丈夫张松，在忙碌工作之余，扛起了与孩子老师沟通的重任，疫情期间诸多繁杂事务，他都默默承担。周末还陪我在西西弗书店自习，两年的坚持，助我终于圆梦清华。

感恩我的领导与同事。他们鼓励我报考清华，并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备考与求学期间，他们理解我的不易，主动帮我分担工作；论文撰写时，又与我并肩作战，一起梳理项目案例、讨论写作思路、陪我开展访谈、为我的调查问卷提供宝贵建议、帮我发放问卷和整理数据。在此，特别感谢国耀、李盼、里纯、怡婧、楚含、王典、王若，以及项目伙伴玲敏、陈颖、吴瑞。还有莆田市东峤镇的肖耀华书记和富铭镇长，也给了我宝贵的建议和切实的帮助。

感恩我的同学。在清华园的三年，收获了真挚的友情，相识相知太美好，共同度过的时光留下了值得珍藏的点点滴滴。感谢同学们的陪伴和帮助，让我的清华岁月充满欢声笑语，为我的人生增添了斑斓的色彩，让我对清华园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回忆，清华从此与我紧密相连。

最后，由衷感恩我的导师邓国胜教授。我最初其实对论文毫无头绪，满心迷茫，是邓老师以无尽耐心与包容引领我，从混沌走向清晰，明确并深挖研究问题。他鼓励我研读文献，精心挑选合适的文章，由浅入深地启发我，还用学长学姐的优秀论文举例，剖析论文的逻辑结构，教给我写作的结构安排和逻辑表达，科学的研究方法。当我陷入困境、焦虑不安时，邓老师既以温和的话语鼓励我，又以严格的标准要求我。他教导我要多跟其他人讨论，要多思考，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希望我通过克服困难不断成长。无论我何时给他发消息，经常是在深夜，他总是能迅速回复。那一条条长长的信息，既是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也是鼓舞人心的力量。何其有幸，成为邓老师的学生，也深切感受到老师对学术的严谨、热爱与执着，对学生的悉心指导与关心爱护。未来的人生，我将以邓老师为榜样，让生命在热爱中绽放活力和光彩。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不包含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内容。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签 名：_____日 期：_____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完成的相关学术成果

个人简历

1986年7月16日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

2003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法学专业，2008年6月本科毕业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2022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至今。

在学期间完成的相关学术成果

无。

指导教师评语

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论文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以福建莆田市 T 村为案例，深入分析了社会组织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效果及其原因。研究发现，通过社会组织的参与，村民的自我认知、自我效能、风险偏好及从众倾向均得到有效提升。而且，村民在公共事务参与、自组织发展、志愿服务及主动学习等方面的行为转变明显，其原因在于社会组织通过构建长期信任、搭建参与平台、协同内外资源及重塑文化认同等路径，形成了“建立信任—推动参与—赋能村民—孵化组织—构建认同”的递进式作用链条，推动乡村从“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转型，其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创新贡献和政策启示。

总的来说，论文观点明确、结构合理、论证充分，表明作者较好掌握了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徐婧同学的论文《社会组织参与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效果及原因分析----以莆田市 T 村为例》，选题具有现实意义。

论文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新内源发展理论的框架下，对社会组织参与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效果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文结构合理，写作规范，数据详实，达到了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学术水平。作者在答辩过程中，回答了答辩委员提出的问题。

根据徐婧同学的论文研究与写作水平以及论文答辩情况，经答辩委员会 5 人表决，一致通过徐婧的论文答辩，并建议授予该同学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